

破产与不良资产 法律 ● 资讯

编委会：

● 主任

李凯

● 副主任

郝朝晖

黄艳

姚华

● 编辑排版

王峰

上海市律师协会

破产与不良资产专业委员会

二〇二五年 一月刊

目录

一、前沿规则

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1

2.关于就《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16

二、新闻资讯

1.广东高院发布破产重整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21

2.成都管协破产沙龙“破产实务纵深问题探析”主题沙龙暨 2024 年年会顺利召开 32

3.《法治日报》重点报道：上海浦东法院打造支持破产重整全流程制度链条，精准施策助“危机”企业寻“新机” 36

4.上海三中院（知产法院、铁路中院）举办破产审判实务培训、“三味·上知学苑”2025 年知识产权审判专题业务培训 40

5.聚焦企业、学校、医院等主体注销规范——这场研讨会讲透实务要点 42

6.聚焦两会|| 破产法治好声音③：加强审执衔接有效性，提升破产审判质效 44

三、行业动态

1.安徽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与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工作交流会 46

2.北京市破产法学会举办 2024 年度学术会议暨三届五次会员大会 48

四、专业研究

1.对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新规热点问题的思考 52

2.探索信托在破产程序中的价值和作用 56

3.企业破产中的环境责任问题 75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 信息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生效日期：2024 年 12 月 31 日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D2ZkbQ-WkbA6eACxNsRZg>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资本市场的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好发挥破产审判职能作用，拯救具有重整价值和市场前景的上市公司，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债权人和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制定了《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于今日正式发布。

一、关于《纪要》的制定背景

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介绍，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提出，要完善破产重整制度，支持上市公司通过破产重整等方式出清风险。《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破产重整是化解上市公司风险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途径，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2 年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破产重整案件日益增多、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变化，破产重整路径、偿债方案、重整投资人等方面均有新的发展，案件审理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明确标准、优化机制。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资本市场的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妥善审理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统一案件办理思路，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工作座谈会。根据会议研讨情况，起草形成了《纪要》。《纪要》的及时发布，有利于解决破产审判实践中的问题，统一上市公司重整案件裁判思路，强化审查审理工作的公开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对于有效拯救困境上市公司，防范化解

风险，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重整质量，维护社会稳定和资本市场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纪要》的主要内容

《纪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坚持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并举、强化债权人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加强司法审判与行政监管协调的总体思路，在总结前期的审理及监管实践基础上，明确了裁判规则，优化了府院联动机制，以实现“明确市场预期、厘清各方权责、保护相关主体权益”的目标。《纪要》在保留 2012 年《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原有九部分总体框架的基础上，基于监管政策、市场环境等变化，删除了原有关于行政许可事项会商与执行 2 部分内容，增加了庭外重组与关联方破产、可转债处理、财务顾问引入、退市公司重整等内容，细化了案件管辖、申请主体和审查标准、信息披露义务及内幕交易防控、重整计划草案有关债权清偿和权益调整的要求、重整计划执行和监督等内容，并对条文序号进行了编排，共计 29 条。同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步制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就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涉及证券市场相关事项的监督管理进行明确，进一步与司法机关形成合力。

在案件审理原则方面，《纪要》新增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原则，强调上市公司重整审判工作必须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将法律规则适用与国家政策相结合，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协作，防止风险外溢、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新增提高重整质效原则，强调上市公司重整逻辑要回归到产业经营，要切实通过股权结构、经营业务、治理模式等调整，实质性改善公司经营能力，优化主营业务和资产结构，实现上市公司规范治理、高质量发展。针对重整上市公司及其人员可能涉嫌财务造假、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内幕交易等刑事犯罪的，在维护社会稳定原则方面，提出要加强公检法的协调配合，做好刑民衔接和统筹工作。

在案件管辖方面，《纪要》强调既要便利当事人参与程序，也要有利于债务风险的及时、有序化解和裁判尺度的统一。此外，针对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通过变更住所地临时改变管辖连接点，企图降低重整失败风险的行为，《纪要》新增有关上市公司住所地在辖区内连续存续时间的规定，切实避免当事人选择管辖等套利行为。

在破产重整的申请和审查方面,《纪要》明确了法院与证监会的协同联动机制,要求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的同时,上市公司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同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报相关情况。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对上市公司重整价值提出意见,反馈给省级人民政府并同步通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充分考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就重整原因、重整价值、重整预案的合法性等进行把关,确保具备拯救价值的上市公司及时、依法通过重整程序化解风险,同时避免不具备重整价值的上市公司不当利用重整制度,浪费市场及司法资源,并对债权人、广大投资者等相关主体造成伤害。

在信息保密和披露方面,《纪要》明确破产重整属于证券法规定的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因审理重整案件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登记及内幕交易防控工作,切实防止内幕交易。在信息披露方面,《纪要》明确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信息披露的责任主体、信息范围和具体要求,强调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重要财务资料、评估报告,以及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应当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予以披露。通过加大上市公司重整过程中信息披露力度,提升重整程序透明度,有效保障债权人、投资者等主体的知情权、参与权,促使其更好作出决策,推动上市公司重整成功。

在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和执行等方面,《纪要》提出重整计划草案既要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具有合法性,也要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具有可行性。一是强调草案制定过程中与债权人、投资者及时沟通、披露以及报告义务,确保相关主体知情权和参与权。二是强调计划草案内容的合法性,针对实践中普遍采取的以股抵债、以信托受益权份额等清偿方式,对担保债权人的清偿安排以及出资人权益调整等重要事项,《纪要》均以问题为导向,对实践中的做法予以规范,切实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如在出资人权益调整问题上,以破产法中的绝对优先原则为基础,同时强调在调整过错股东股权时,应当优先调整存量股,以体现对其惩罚性。三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纪要》对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处理方式、重整投资人资格审查、探索引入财务顾问等均首次予以明确,有效提升上市公司重整质量和实效。需要注意的是,引入中介机构既要发挥其“看门人”的积极作用,也要对其行为予以规范,防止“不作为、乱作为”,造成相关主体利益损失。此外,对于

相关中介机构的聘用和报酬等，应当严格遵守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确保程序合法、成本可控。四是针对实践中重整计划执行缺乏约束监督等问题，《纪要》强调重整投资人、债务人等要严格执行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的重整计划，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管理人要切实负起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主体责任，及时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报告执行情况。重整计划关于执行完毕的标准、期限应当明确、清晰、合理，不得为了迎合会计、报表制定等需要刻意降低执行完毕的标准，避免后续衍生新的问题。

在庭外重组及关联方破产方面，为有效发挥《纪要》对庭外重组的指引作用，规范庭外重组或者预重整行为，《纪要》规定上市公司与债权人、出资人、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在庭外重组或者预重整中达成的相关协议，应当符合《纪要》关于重整计划草案制定以及相关监管规定的要求，实现庭外重组的市场化、法治化。针对实践中上市公司股东或者子公司等关联方重整，《纪要》强调应当坚持法人人格独立原则，以单独判断破产原因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则，对外担保等或有负债应当综合考虑主债务人清偿能力以及追偿等问题，不得无偿利用上市公司资源清偿关联方债务，防止利用关联关系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等不法行为损害上市公司债权人利益。此外，根据证监会的监管政策，资产管理产品、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等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的股权结构调整亦应遵守上述监管要求，确保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清晰、完整、稳定。

在退市公司重整方面，退市公司作为企业破产法的适用主体，具备拯救价值的亦可及时通过重整制度化解债务风险，对此《纪要》明确人民法院审理退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可以参照上市公司重整相关规定，且由于退市公司具有公众公司的一般特性，涉及利益主体较多，人民法院应当加强与地方党委、监管机构等协作，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确保案件审理依法有序推进。

在加强司法审理与证券监管协作方面，《纪要》针对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中介机构等主体在破产重整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纪要》设置重大事项通报机制，人民法院将与证监会及时开展会商，针对损害债权人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通过采取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等措施，加大打击力度，达到“办理一案，震慑一片”的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切实 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各交易所，各下属单位：

现将《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此类案件的监督指导，及时总结审判经验，确保依法妥善审理好此类案件。在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分别层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2〕261号）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4年12月31日

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

工作座谈会纪要

自2012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2〕261号）以来，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在拯救困境上市公司，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升资本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和资本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破产重整案件日益增多、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变化，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与情况。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资本市场的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发挥破产审判职能作用，拯救具有重整价值和市场

前景的上市公司，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债权人和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月8日在北京召开工作座谈会，对近年来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了总结、梳理、讨论，就进一步完善和统一规则适用，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相关重要问题取得了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的审理原则

会议认为，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事关资本市场的风险化解和健康发展，事关债权人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事关职工权益保障和社会稳定。人民法院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妥善处理社会公平与重整效率、企业拯救与市场出清、司法主导与行政监管的关系，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在审理中应注意坚持以下原则：

1.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原则。破产重整案件审判工作是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必须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民法典、企业破产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将法律规则适用与国家监管政策目标实现相结合，将个案风险化解与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相结合，切实防止风险外溢。强化与证券监管部门的协作，切实防范相关方利用破产重整恶意炒作、干扰市场秩序以及实施证券欺诈等行为，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 依法公正审理原则。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参与主体众多，涉及利益关系复杂，人民法院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既要有利于化解上市公司的债务和经营危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又要防止没有拯救价值的上市公司利用重整程序规避市场出清以及逃废债务，滥用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既要保护债权人利益，又要兼顾职工利益、出资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妥善处理好各方利益冲突。

3. 提高重整质效原则。充分发挥重整制度拯救功能作用，引导管理人、上市公司深入分析陷入困境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切实通过股权结构、经营业务、治理模式等调整，实质性改善公司经营能力，优化主营业务和资产结构，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上市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未获批准、重整计划执行不能且无法变更或者依法变更后仍执行不能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宣告破产清算。

4. 维护社会稳定原则。上市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因涉及债权人、上市公司、出资人、企业职工等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各方矛盾比较集中和突出，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人民法院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风险预警、部门联动、资金保障等协调机制的作用，积极配合政府做好上市公司重整中的维稳工作，并根据上市公司的特点，加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重整上市公司及其人员涉及刑事犯罪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人民法院之间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和刑民统筹，共同维护社会稳定。

二、关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的管辖

会议认为，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涉及法律关系复杂，影响面广，案件管辖既要便利当事人参与程序，也要有利于债务风险的及时、有序化解和裁判尺度的统一，还要依法防范当事人为选择管辖法院而临时改变管辖连接点的行为。

5. 案件管辖。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应当由上市公司住所地，即上市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上市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由上市公司注册登记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向人民法院提交（预）重整申请时，上市公司住所地应当在该法院辖区内连续存续1年以上。

三、关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申请及审查

会议认为，要全面准确理解破产重整的拯救功能，支持尚有拯救希望的危困上市公司及时通过重整程序化解风险，切实防止重整程序空转，损害债权人、投资者等主体的合法权益。

6. 申请主体。上市公司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上市公司、债权人、单独或者合计出资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对上市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7. 申请材料的提交。申请人申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除提交企业破产法第八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关于上市公司具有重整可行性的报告、上市公司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出具的维稳预案等。

上市公司自行申请破产重整的，应当提交经股东会表决同意的证明材料，以及切实可行的职工安置方案。

债权人申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应当提供其已经通知上市公司的有关证据。

8. 人民法院对重整申请的审查。债权人提出重整申请，上市公司在法律规定时间内提出异议的，或者债权人、上市公司、出资人分别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和重整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

人民法院召开听证会的，应当于听证会召开前通知申请人、被申请人，并送达相关申请材料。公司债权人、出资人、实际控制人等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准许。人民法院应当就申请人是否具备申请资格、上市公司是否已经具备重整事由、上市公司是否具有重整可行性等内容进行听证。涉及证券监管事项的，应当听取属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意见。

人民法院在裁定受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前，应当将审查意见及相关材料逐级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

9. 协同联动机制。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的，上市公司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同步向中国证监会通报情况，并将所出具的维稳预案以及上市公司与债权人、出资人、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已签署或者达成的有关债权调整、重整投资等协议一并通报。中国证监会应当就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等事项向省级人民政府出具意见，并同步通报最高人民法院。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不具备作为上市公司的重整价值：

（1）上市公司因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可能被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的重大违法行为正在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尚未结案；

（2）根据相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等情况，上市公司可能被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3）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规范运作等存在重大缺陷，可能被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4) 其他违反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导致上市公司丧失重整价值的情形。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利用上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原则上应当在进入重整程序前完成整改。

四、关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信息保密和披露

会议认为，破产重整属于证券法规定的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证券监管机构规定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做好内幕交易防控和信息披露工作。

10. 防止内幕交易。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以及人民法院因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案件而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等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内幕交易防控的要求。管理人成员存在或者涉嫌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或者依申请及时撤换。

11. 信息披露责任主体。上市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管理人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应当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承担法律法规、交易场所业务规则 and 公司章程规定的原上市公司董事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和义务，相关主体应当及时配合。上市公司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上市公司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及时、公平披露信息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管理人应将其知悉的涉及管理人职责的信息披露事项及时告知上市公司。

未按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12. 信息披露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交易场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披露涉及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信息，有效保障债权人、投资者等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程序参与权。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重要财务资料、评估报告，以及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应当予以披露。

人民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后，管理人应当及时披露其成员、职责分工及联系方式、公司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模式、信息披露事务责任主体名称及成员等信息。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提供的材料与已披露的信息应当保持一致。如果有不一致的，应当作出专项说明并披露。

五、关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及表决

会议认为，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和表决是重整程序的关键环节，是重整拯救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重整计划草案相关内容应当依法合规，有利于实质性化解债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有效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实现各方利益平衡。

13. 重整进展的报告义务。管理人应当分阶段及时向债权人委员会报告债务人财产的接管和调查情况、债务人财产评估、审计情况，以及重整计划草案制定进展等涉及重整的重大事项，债权人委员会有权就重整计划草案发表意见。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在提交债权人会议十五日前，在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上披露。

14. 重整计划草案总体要求。重整计划草案应当详细、明确，并具有可执行性，经营方案涉及盈利预测的，应当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前景、行业周期、企业经营实际情况等相关因素，不得随意夸大。

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比例、重整投资人资格及获得股份的价格、股份锁定期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人民法院在审批重整计划草案时，应重点审查重整计划内容以及重整投资人资格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国家产业政策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等相关规定，必要时可以征求属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的意见。

15. 债务清偿安排。债务清偿方案应当明确、可行，不得以明显无法执行或者难以变现的方式清偿债务。采取成立信托计划方式清偿的，应当明确信托财产范围、受托人职责以及信托期限。采取以股抵债方式清偿的，应当重点说明以股抵债价格是否客观反映公司股票的公允市价以及据此计算的债务清偿率是否合理。

债务人继续保留担保物的，应当确保担保债权人可以就担保财产现值获得全额清偿，不足部分按照普通债权清偿。如果对该担保债权分期清偿的，应当就延期清偿的利息确定合理利率，且担保债权人在清偿期限内可以优先于就该担保物

新设立担保权的债权人获得清偿。担保财产价值应当结合担保物未来使用方式和目的进行评估，不得简单按照清算价值确定。

上市公司涉及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的，应充分考虑可能需赔付投资者的金额，并在清偿方案中作出安排。人民法院可以就预估的损害赔偿金额征询投资者保护机构意见。

16. 出资人权益调整。上市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普通债权人不能在重整计划中全额获得清偿的，原则上应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因违法违规行为对上市公司造成损害的，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时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支配的原有股权作相应调整。权益调整方案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可供转增的资本公积金应当以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定期报告为准。

17. 重整投资人。拟引入重整投资人的，重整投资人应当具有相应的资源和能力，重整计划草案中应当明确拟引入的重整投资人相关信息及其参与重整的条件、获得的股份数量和价格等内容。重整投资人认购股份应当以货币形式支付对价，并在支付全部价款后办理股票登记过户手续。

18. 出资人组的表决。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应当设置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会议的召开程序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关于召开股东会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或者管理人应当提供网络表决方式。

表决涉及引入重整投资人等事项的，重整投资人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且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出资人组对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等事项的表决，经参与表决的出资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即为该组表决通过。上市公司披露表决结果时，应当分别说明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19.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司被裁定破产重整的，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未对破产重整程序中的交易安排和转股权作特别约定的，相关主体应当及时召集持有人会

议，就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的交易安排和转股权行使期限作出决议。考虑到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需要，交易期间不应晚于转股权行使期间，转股权行使期间的截止日不应晚于债权申报截止日。关于可转债的债权金额计算，应以票面金额加上到期利息进行确定。

20. 探索引入财务顾问。为有效提高上市公司重整质效，上市公司或者管理人可以聘请证券公司担任财务顾问并履行以下职责：

（1）协助管理人、上市公司制定重整计划草案，研究分析破产重整相关活动可能涉及的法律、财务、经营等风险并提出对策建议；

（2）接受管理人或者上市公司的委托，进行重整融资筹划，帮助引入增量资金；

（3）根据法律法规和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在充分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财产变价、权益调整、转增除权以及其他重要事项，客观、公正地发表专业意见，督促管理人及相关各方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21. 勤勉尽责要求。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未勤勉尽责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给债权人、上市公司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存在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由中国证监会依法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者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给债权人、上市公司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管理人在聘用上述机构过程中存在过错的，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六、关于重整计划的执行

会议认为，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对于最终实现重整目标，拯救企业至关重要。管理人应当积极履职，督促债务人及相关各方主体严格执行重整计划，确保债务清偿方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经营方案的落实。

22. 重整计划执行。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重整投资人均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执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

重整计划中相关事项构成公开承诺的，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履行。对业绩补偿承诺，除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外，原则上不得变更。

23. 重整计划执行监督和责任后果。管理人应当切实履行法定监督义务，定期向人民法院、债权人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情况。重整计划中明确的重要事项尚未完成的，管理人的监督期限应当相应延长。

重整投资人未按投资协议或者重整计划相关约定履行义务，管理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债务人不能按照重整计划清偿债务，且债权人会议对于重整计划变更未表决通过或者不能形成决议的，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执行重整计划，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24. 重整完毕。重整计划载明的执行完毕标准以及期限应当明确、清晰、合理，涉及引入重整投资人以及出资人权益调整的，管理人应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内实施完毕。

管理人或者上市公司等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因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七、加强司法审理与证券监管协作

会议认为，资本市场透明度高、规范性强、牵涉利益广，应加强监管机构与司法机关的信息共享和会商协调，防范相关方通过重整程序损害债权人及投资者利益。

25. 重大事项通报机制。重整程序中，证券监管部门发现上市公司及相关方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实施前述行为，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可以致函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关注，必要时启动会商机制。

人民法院发现管理人、重整投资人、财务顾问等相关方存在涉及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或者发现相关方提交的材料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一致的，应当立

即将相关情况逐级层报，由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者予以行政处罚。

八、庭外重组及关联方破产

会议认为，优化完善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衔接机制，可以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并有效提升破产重整质效。对于上市公司关联方破产重整，既要充分利用重整制度优势实现上市公司整体风险化解，又要避免关联方逃废债务、侵害上市公司以及债权人合法利益。

26. 庭外重组。上市公司与债权人、出资人、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通过庭外重组谈判，签署或者达成债权调整、引入重整投资人等相关协议的，应当符合本纪要关于重整计划草案制定的要求，并按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7. 上市公司关联方破产。上市公司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实施破产重整、和解或者清算时，不得无偿占用上市公司资源清偿债务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破产的，不得导致契约型基金、信托计划或者资产管理计划等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第一大股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破产申请受理及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就涉及上市公司的相关事项征求上市公司属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意见。

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重要子公司破产重整，将导致上市公司无具体业务或者存在其他丧失持续经营能力情形的，人民法院对其重整计划草案不予批准。子公司破产重整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应当依法聘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就资产定价公允性和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发表专业意见。

28. 上市公司与关联公司协同重整。人民法院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关联公司重整进行协调审理的，应当坚持法人人格独立原则，明确区分和界定各公司资产以及债权债务关系，各公司之间债权债务的抵销应符合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协同重整确有必要集中管辖的，相关法院应当提前沟通协调，并将沟通结果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上市公司为关联公司清偿债务的，应当经上市公司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且该关联公司应当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包含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上市公司不得为该子公司清偿债务。

九、退市公司重整

会议认为，退市公司具有公众公司的一般特性，人民法院在审理其破产重整案件中，要加强与证券监管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切实维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确保案件审理依法有序稳妥推进。

29. 退市公司重整。人民法院在审理退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时，可以参照上市公司重整相关规定，加强信息披露和内幕交易防控，依法严格审查债务清偿方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经营方案等重整计划相关内容。

退市公司股东人数众多，人民法院应当做好案件办理等工作，并及时上报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与退市公司住所地人民政府、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加强协作，必要时可以专门会商。

关于就《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 信息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文日期：2024 年 12 月 31 日
- 访问链接：<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81/c7529723/content.shtml>

为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监管，有效化解上市公司风险，推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证券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会起草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 电子邮件：ssb@csrc.gov.cn。
2.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 号富凯大厦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司，邮政编码：100033。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30 日。

中国证监会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监管，有效化解上市公司风险，推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证券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依法建立健全与人民法院关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协作机制，对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涉及证券市场相关事项进行监督管理。

证券交易所依法制定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信息披露规则，对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自律管理。

第三条 上市公司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座谈会纪要》向中国证监会通报情况的，可以包括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目前的资产负债情况、偿债能力分析、是否存在退市风险，明确重整必要性、重整实现目标等内容。

第四条 上市公司申请或者被申请破产重整的，应当对是否存在下列事项进行自查并对外披露：

（一）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证券交易所强制退市的；

（二）涉及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证券交易所强制退市的；

（三）涉及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等方面的重大缺陷，可能被证券交易所强制退市的；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违规操纵上市公司向其提供担保的；

（五）其他违反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导致上市公司丧失重整可能的。

第五条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破产管理人及其成员，债权人，重整投资人等破产重整相关方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时、公平地披露或者提供涉及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信息，保证所披露或者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六条 上市公司、破产管理人及其成员、重整投资人、债权人、为破产重整事项提供有关服务的中介机构及有关各方，对所知悉的破产重整事项在依法依规披露前负有保密义务。

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应当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以及证券交易所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内幕交易防控的要求。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破产重整相关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违法活动。

第七条 重整计划草案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应当充分说明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原因、必要性及合理性，根据转增股票用途及目的审慎确定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量，资本公积金转增比例不得超过每十股转增十五股。可供转增的资本公积金应当以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或者季度报告为准。

第八条 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引入重整投资人的，应当明确重整投资人相关信息及其获得的股份数量和价格，合理确定重整投资人投入资金的用途。重整投资人获得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整投资协议签订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破产重整中涉及重整投资人、债权人、股东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权益变动的，相关方应当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履行相关义务。重整投资人应当披露是否存在代他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

重整投资人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等事项的，应当说明是否需要取得相关部门批准及其批准情况。重整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不得属于契约型基金、信托计划或者资产管理计划。

第九条 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对相关方持股期限作出约束，以确保重整后公司股权、经营相对稳定。

重整投资人自根据重整计划取得股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重整投资人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上述期限为三十六个月，其一致行动人应当一同遵守前述锁定要求。

重整后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上市公司原有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重整计划新取得的股份，自取得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应当一同遵守前述锁定要求。

按照重整计划对股权调整完毕后，上市公司披露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其第一大股东应当比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的相关规定，但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足百分之五的除外。

第十条 上市公司不得在破产重整或者债务重组方案实施的重大不确定性消除前，提前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在判断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上市公司应当综合考虑以下事实和情况：

（一）全体重整投资人是否按照重整计划约定将认购股份的全部款项支付给上市公司；

（二）债权人是否已按重整计划获得偿付或者偿付给债权人的偿债资源是否已划转到管理人账户；

（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是否已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并披露；

（四）其他与判断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相关的事实和情况。

负责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勤勉尽责、规范执业，高度关注债务重组收益确认时点的合理性，履行充分、必要的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审慎发表专业意见。

第十一条 上市公司前期重大资产重组中涉及的业绩补偿承诺，不得通过重整计划予以变更。

上市公司或者破产管理人应当通过提起诉讼、申请保全等方式，及时向业绩补偿承诺方主张权利，督促其严格履行作出的承诺。

第十二条 上市公司重整计划涉及盈利预测的，应当客观、审慎，充分说明盈利预测的依据、理由、合理性及其可实现性，是否与业绩补偿承诺相关联，并应当聘请财务顾问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第十三条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破产管理人及其成员，重整投资人，债权人及有关各方违反本指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根据违规行为性质、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第十四条 本指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东高院发布破产重整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 信息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日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d6MxZusCWH23V5AaFiIGA>

今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破产重整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这批案例通过实质合并、庭外重组、庭内预重整与重整、个人破产等多元拯救方式，帮助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人等各类市场主体，在“危机”中寻找“新机”，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服务保障民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司法创新和实践。

此次共发布 15 个案例，这些案例反映了广东法院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在某石化公司等 10 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中，引入 10 亿元共益债为某国“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注入新资源，成功挽救了企业的海外营运业务，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发展大局。在全省首例综合性民营医院执行转破产成功案件中，为深陷债务危机的民营医院引入投资 6.2 亿元，使医院主体资格得以存续，保住了 550 多名医护人员的生计，有效实现多方共赢及社会资源价值最大化。在某机械公司破产重整案中，通过府院联动，充分发挥困境企业危机发现、预警、挽救机制作用，避免了 170 多家供应商受波及，保持了该公司在全球先进的技术优势。

近三年来，广东法院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在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分担风险、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帮助康美药业、广州浪奇等 160 余家企业重获新生，保留 5 万余个就业岗位，安置职工 6 万余人，破产案件平均审理时间缩短至 10 个月，破产成本下降超 20%。广州连续 2 年荣获全国营商环境评比第一，深圳连续多年位列前三。

广东法院破产重整服务高质量发展

典型案例

01 某石化公司等 10 家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依法审慎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发展大局

基本案情：某石化公司经营范围为批发汽油、煤油等。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等影响，公司业务严重受阻，流动资金紧张，无力偿还债务，无法通过自救方式解决在某国投资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佳某油田”的经营困境，遂向广州中院申请破产重整。2023年7月，广州中院依法裁定受理某石化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管理人。同年10月，管理人以某石化公司等10家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财产成本过高为由，申请将某储运公司等9家公司与某石化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审理情况：广州中院充分调查、精准识别重整价值，快速决定某石化公司适用重整程序，以法人人格高度混同作为审查实质合并重整的核心要件，明确合并范围、程序规则和异议权利人的救济途径。2024年3月6日，广州中院依法裁定某石化公司等10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6月26日，广州中院裁定批准某石化公司等10家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本案是广东省首例直接涉及“一带一路”项目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成功的案件，建设工程款债权、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均得到100%清偿，普通债权清偿比例较单独清算显著提升，实现了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且成功引入10亿元共益债盘活了油田资产，保住了当地职工、国内派遣职工共计1100余人的就业岗位，助力企业恢复经营能力，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号召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司法服务和保障。

02 某集团公司破产重整案——司法重整挽救危困上市公司，护航高质量发展

基本案情：某集团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从事建筑装饰设计施工、绿色建材研发生产等业务。2020年起，受房地产行业形势等因素影响，该公司连续三年亏损，面临退市风险。公司负债累累，账面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回收难度较大。经债权人申请、债务人同意，深圳中院对某集团公司启动预重整机制，并指定临时管理人。

审理情况：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在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提前开展清产核资、债权申报、招募投资人、拟定重整计划草案、组织协商谈判等工作，为重整做好准备。2023年7月20日，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某集团公司重整申请。11月28日，深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12月22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本案创新适用预重整机制，为危困企业紧急纾困，确保资产和经

营的完整性。通过现金清偿与留债、信托、债转股等金融工具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债务清偿，切实阻断房企债务风险向下游蔓延，4万余名农民工、3800余家供货商、2万余名中小股民得到保护，1600余名职工稳住就业，有效维护了上下游企业的经营稳定，以及建筑装饰行业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

03 梁某某个人破产重整案——再建型个人破产再创个人和社会价值

基本案情：2018年6月，梁某某创业成立某科技公司，开发及销售蓝牙耳机产品。由于不懂市场运营，梁某某创业失败，负债75万元。2021年3月，梁某某向深圳中院提出个人破产清算申请。在法院听证调查过程中，梁某某表示愿意尽力清偿债务，请求将破产清算申请变更为重整申请。同年5月，深圳中院依法裁定受理梁某某的个人重整申请，并依法指定管理人。

审理情况：管理人通过面谈、现场走访、调取银行流水、鹰眼查控等方式进行了调查，协助梁某某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债权人会议经表决，通过了该重整计划草案。2021年7月16日，深圳中院裁定批准该重整计划，终结重整程序。2023年4月14日，梁某某依照重整计划提前15个月清偿了全部借款本金67万元。6月16日，深圳中院经审查，裁定免除梁某某重整计划载明债务范围内未清偿债务的责任。

典型意义：个人破产制度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撑起了一个喘息的空间，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制度支撑和风险控制。梁某某通过个人破产重整制度，最终实现了债务纾缓，重新投入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再创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帮助个人债务人经济再生的同时，个人破产制度也有助于激励债务人积极清偿债务，保障和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让“借贷收还”回到一个有序且合理的法治轨道。

04 某医院破产重整案——广东首例综合性民营医院执行转破产成功案件

基本案情：某医院是东莞规模较大的综合性民营医院，集医疗、预防、科研、教学于一体，有500余张床位，职工人数550余人。近年来，受关联公司资金链断裂影响，某医院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大量资产被多地法院查封、冻结。2022年5月，经债权人申请，东莞第一法院启动“执转破”程序，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7月，东莞第一法院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根据债务人、主要债权人的一致推荐指定临时管理人。

审理情况：预重整阶段，临时管理人完成债权申报和审查、资产评估、财务审计、预重整草案制定和召开债权人会议等准备工作。法院与商会联合，招募引入意向投资人，不仅提供共益债支持医院正常经营，还向医院注入重整投资款 6.2 亿元，成功化解企业内部的治理问题和外部的债务危机。2023 年 1 月 19 日，东莞第一法院在受理重整 15 天后，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9 月 22 日，6.2 亿元投资款全额到位，某医院得以重整再生。

典型意义：本案是广东首例综合性民营医院执行转破产、预重整转重整成功的案件。东莞第一法院打好“自主协商”“司法支持”组合拳，在临时管理人的监督下，破产企业“破产不停产”。从决定启动“预重整”到批准重整计划用时不到 7 个月，成功为深陷债务困境的某医院引入重整投资款，普通债权清偿率提升至 51.23%，医院主体资格得以保留，550 多名医护人员的就业生计得以稳定，有效促进债权人、债务人、职工等多方共赢，实现社会资源价值最大化。

05 某英文学校破产重整案——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市场化破产重整

基本案情：某英文学校是全国首家双语（中英文）学校，有在籍学生总人数 2500 余名，在职教职人员 200 余名。因经营管理不善，学校自 2000 年起处于高负债运行状态。因其主体特殊性，各类债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案件一直无法执行。2022 年 7 月，经债权人申请，广州中院受理该学校破产重整。

审理情况：经清产核资、公开招募、竞价，学校成功招募重整投资人，投资 2.6 亿元用于清偿债务，另投资 2.5 亿元对校园进行改造升级。2023 年 2 月 24 日，某英文学校重整计划草案经表决通过。其后，广州中院裁定批准某英文学校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11 月，该学校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学校经营危机不仅关系到债权人的经济利益，也关乎学生与家长的教育权益。本案中，某英文学校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破产重整，引入优质专业教育投资人，学校的主体资格、办学资质得以延续，教师职工继续留任，2500 余名学生正常学习不受影响，不仅有效提升普通债权人清偿率，而且，教学设施、教学质量全面升级，从岌岌可危的办学状态，成为优质教育资源，极大提升了区域教育水平。

06 某实业公司破产重整案——司法重整引入产业投资人，为上市公司增量赋能

基本案情：某实业公司是一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致力于车载CID、自动驾驶及车联网相关软硬件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2018年下半年开始，某实业公司生产经营受到行业因素影响，面临退市危机。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债权人申请某实业公司破产重整。在重整申请审查期间，经某实业公司申请，深圳中院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

审理情况：2021年11月26日，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某实业公司重整申请。12月12日，管理人向深圳中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了重整计划草案，12月27日经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表决通过。因重整计划规定的债权受偿方案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合法公平，同日，深圳中院裁定批准某实业公司重整计划。12月31日，某实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重整程序终结。

典型意义：本案充分关注重整投资人与债权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平衡，在重整计划中合理确认增股比例、锁定重整投资人股份、由重整投资人进行业绩承诺，夯实股票抵债价格，确保各方权益得到平衡、共享上市公司重整收益。通过重整程序引入与其行业密切相关的产业投资人，为公司生产经营打通上下游资源通道，不仅维持了公司上市主体地位，更为公司增量赋能，帮助100余名职工稳住就业，防止债务危机向上下游超过3200家汽车电子零部件供应商和客户传导。

07 某光电公司破产重整案——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高效衔接助力上市公司重生发展

基本案情：某光电公司主营教育照明、紫外消杀、锂电池生产设备制造，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该公司因投资并购失利出现流动性资金危机，无法清偿全部到期债务。2022年7月，债权人向佛山中院申请对其进行重整。为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佛山中院尊重债务人与主要债权人的意愿，决定采用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整相关工作。同年8月，经债务人与已知债权人协商确定人选，佛山中院依法指定临时管理人。

审理情况：某光电公司在临时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生产经营事务并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通过市场化商业谈判，某光电公司成功招募投资人，与债权人、投资人协商拟定了重整预案，并获得了一定数量已知债权的书面同意。2022年10月31日，佛山中院裁定受理某光电公司重整。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12月2日，佛山中院依法裁定批准

该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12月21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2023年4月23日，该公司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均被撤销。

典型意义：本案在充分把脉企业“病症”后积极开展预重整，仅用时32天即重整成功，切实发挥了破产程序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作用。本案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确认了各债权人对重整预案所作表决意见的法律效力，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为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延伸至庭内重整提供了实践样本。体现了法院在破产审判中坚持服务大局，依托府院联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成企业重生，平衡各方利益主体关系实现多方共赢。

08 某实业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发挥预重整优势，推动民营企业规范经营

基本案情：某实业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曾是国内氨基复合材料龙头企业，在收购了某通信技术公司后，逐步关停化工业务，转向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受业务亏损、经营不善等影响，2020年以来，净利润一路下滑，引发退市风险。同时，因信息披露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某实业公司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面临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负债累累并拖欠160多名职工工资及社保资金。2023年8月，某化工公司以某实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申请对某实业公司进行预重整及重整。9月6日，揭阳中院决定对某实业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

审理情况：揭阳中院联合证监会和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推进与中小股东及职工的诉讼调解赔偿等事宜，确保符合上市公司重整的审批要求。临时管理人如期完成调查，向法院提交了预重整工作报告。2023年11月24日，揭阳中院裁定受理某实业公司破产重整，指定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继续担任管理人。12月21日，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获表决通过。12月25日，重整计划草案获高票通过。当日，揭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12月29日，揭阳中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本案从正式裁定重整到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重整程序仅用时36天。法院充分发挥府院联动积极作用，妥善解决破产企业职工欠薪和安置问题，帮助职工再就业，普通债权实际清偿率高达50%以上，还为公司引入约11亿元资金，化解16亿元企业债务，有效保护了债转股债权人和数万名中小股东的利益。重整成功后的某实业公司“轻装上阵”，深耕算力产业经营，主业盈利

能力稳步提升，成功转型并实现“摘星脱帽”。

09 某肥业公司破产重整案——破产保护机制助力小微农企脱困重生

基本案情：某肥业公司是一家以研究所为技术依托，集生产、研发、推广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补贴。疫情期间，受物流出口、原材料价格等影响，某肥业公司现金流断裂，陷入财务和经营困境。2023年7月，通过广州中院、广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破产前综合服务机制提供的咨询和指导，某肥业公司债权人向广州中院申请该公司破产重整。

审理情况：2023年8月30日，广州中院裁定受理某肥业公司破产重整案，并指定管理人。管理人综合投资人意见拟定重整计划草案，原出资人某农科所及某农科院通过保留股权方式，继续为重整后的某肥业公司提供支持和指导。该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一致通过。2024年8月21日，广州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某肥业公司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本案通过破产前综合服务机制，提前为困境小微企业提供破产咨询和引导服务。通过破产重整，企业主营业务和核心资产得以存续，最大程度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某农科所得以继续发挥技术优势，为某肥业公司生产发展注入科技动能，彰显了破产审判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充分发挥助力小微农企脱困重生的功能价值。

10 某机械公司破产重整案——困境企业预警护航“新质生产力”

基本案情：某机械公司是全球挤出吹塑设备市场的龙头企业德国某机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23年12月，佛山顺德行政职能部门监测到某机械公司受其境外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影响发生债务危机，遂启动困境企业预警机制，把情况通报给佛山市顺德区破产事务联合协调小组。经过协调小组的统筹组织调查、研判，债权人及时向顺德法院申请某机械公司破产。2024年1月，顺德法院依法裁定受理某机械公司破产清算。

审理情况：顺德法院通过府院联动，联络到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及多省市的行业协会，成功招募到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参与重整投资。顺德法院指导管理人

制定重整方案，采取将职工安置方案、在建订单捆绑实物资产进行整体出售的方式，实现人员、技术、供应链和销售网络等核心运营价值、经营事业的整体转让。2024年4月18日，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并选定重整投资人。4月22日，顺德法院裁定清算转重整，并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典型意义：本案中，顺德破产事务联合协调小组将危机发现、预警向前延伸至市场监管、行政执法领域，在企业爆发债务危机之初主动介入，通过司法救治成功将企业从崩溃边缘拉回正轨。不仅解决了153名职工的就业，避免170多家供应商受波及发生倒闭风险，还保持了该公司在全球先进的技术优势，充分体现了破产实质化运行对挽救危困企业、保留和升级企业运营价值、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功能。

11 某科技发展公司破产重整案——“破产不停产”保障环保企业接续发展

基本案情：某科技发展公司主要从事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等业务。因原控股公司不规范经营，公司资金链断裂，陷入危机。2023年4月，该公司向茂名中院申请破产重整。法院初查后认为某科技发展公司的危废填埋处置场资质稀缺、生产设施设备齐全、市场前景广阔，在广东省危废产业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于2023年6月13日裁定受理某科技发展公司重整申请。

审理情况：法院通过“破产不停产”的方式，批准某科技发展公司在管理人监管下自行经营，保障了重整价值最大化。通过企业破产府院联动机制，借助政府平台招商引资，最终成功引入当地国有企业某集团公司作为投资人。法院经审查认为某科技发展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具备可行性，依法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本案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通过破产重整助力环保企业脱困重生。一方面积极采取“破产不停产”方式，确保职工就业、维护经营资质及客户资源，一方面深化府院联动，化解投资人引入难问题，实现优先债权清偿率100%，普通债权每户20万元以下全额清偿，20万元以上部分受偿率30%，切实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2 某电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破产重整助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本案情：某电子公司属于中小微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自产单面至多层线路板。该公司持有排污许可证，具有一定稀缺性。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提出破产清算申请。2021年2月，珠海中院裁定受理某电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管理人。审理期间，环保部门责令某电子公司停产整治，排污许可证面临吊销风险。为保住某电子公司营运价值，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法院依申请裁定转入重整程序。

审理情况：在法院、管理人协助下，某电子公司落实具体环保整改要求，确保污染物排放持续稳定达标，实现整改到位、恢复生产。同时，将投资人绿色经营意愿与能力纳入考量因素，并成功招募投资人。2022年6月30日，珠海中院裁定批准某电子公司重整计划及补充计划，终止某电子公司重整程序。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珠海中院及管理人督促公司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依法生产经营。

典型意义：本案将治污与债务处置并重，有效维护企业无形资产，最大化保障企业经营价值。法院在程序转换、企业经营、投资人招募、重整计划草案制定与执行等环节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督促企业履行环保责任，促进企业减污降碳和重整转型升级，走能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增长方式优、规模效应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3 某医药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简化重整程序，快速拯救小微企业

基本案情：某医药公司股东为深圳某医药投资公司。因公司经营不善被申请破产清算。2022年12月，广州中院裁定受理某医药公司破产清算。清算过程中经管理人调查，某医药公司持有包含药品经营许可证（批发）在内的特殊资质3项，管理人在广州中院“智融”平台成功预招募投资人，进一步通过市场验证其重整可行性。债权人遂向广州中院申请某医药公司破产重整。

审理情况：2023年6月2日，广州中院召开听证，裁定受理某医药公司重整。随后，广州中院主持债权人会议对某医药公司重整计划进行表决，获全部同意。同日，广州中院裁定批准某医药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某医药公司重整程序。

典型意义：某医药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人民法院准确识别小微民营企业的重整价值，并经广州中院“智融”平台成功招募投资人。在充分征求全体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后，法院当庭作出裁定，一日办结该小微企业重整案，创下“一

天内”挽救小微企业的最短纪录，取得了多赢的良好效果，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14 某房地产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发挥预重整制度优势，高效盘活房地产企业

基本案情：某房地产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2021年起，该公司投资开发的房产项目陷入销售困境，出现流动性危机。同时，由于为多家企业提供担保被众多债权人起诉及查封主要财产，大量资产无法及时变现，资金链断裂，公司经营陷入困境。2023年3月，肇庆中院根据该公司申请，受理其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

审理情况：在预重整阶段，临时管理人对某房地产公司资产进行清算，并在某拍卖平台公开招募到新的投资人。2023年7月，预重整计划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7月26日，肇庆中院裁定受理某房地产公司重整申请。9月19日，肇庆中院依法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2024年6月，案涉楼盘经当地住建部门竣工验收备案，待确权办证给820多名购房人。

典型意义：肇庆中院引入“预重整”程序，争取各方支持，加速预重整向重整工作的推动，大大降低了破产重整成本，提高了破产审判效率。通过预重整程序，困境企业尽早盘活了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实现房地产项目复工复建，既维护了购房者合法权益，实现“保民生、保稳定、保交楼”，又有效防范化解了房地产金融风险，对房地产企业救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5 某自来水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破产重整保障民生用水促多方共赢

基本案情：某自来水公司系由两家公司合作投资开办的项目公司，主营业务是集中式供水。因一家合作企业资金链断裂导致工程无法完工，合作无法履行。2018年，另一家合作企业诉至惠州惠阳法院要求解除合作合同并解散某自来水公司。惠阳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后，经清算组清算，某自来水公司资不抵债，且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向惠州中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2021年2月，惠州中院裁定受理某自来水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抵押债权人某水务公司向惠州中院申请对某自来水公司进行重整，并愿意作为重整投资人。

审理情况：惠州中院经审查认为某自来水公司资产涉及自来水饮水供水工程，具备重整价值。2023年3月，裁定对某自来水公司进行重整。5月，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6月，惠州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9月，惠州中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某水务公司取得某自来水公司股权，恢复某自来水公司的正常运营，重启相关供水一体化工程。

典型意义：某自来水公司关系地方民生用水工程。惠州中院通过指导管理人与重整方、债务人及债权人进行充分沟通，高效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全体债权人获得公平清偿，抵押权、税收债权100%清偿，税收债权及普通债权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有效挽救破产企业，实现债务人、债权人的多方共赢，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十四期成都管协破产沙龙“破产实务纵深问题探析”主题沙龙暨 2024 年年会顺利召开

- 信息来源：内江市破产管理人协会 日期：2025 年 1 月 16 日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HL9LEtg7di15cnMs5jlXQ>

2025 年 1 月 9 日，由成都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主办，成都竞择破产清算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点破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阿里资产，六家机构联合承办的第十四期成都管协破产沙龙“破产实务纵深问题探析”主题沙龙暨 2024 年年会顺利召开。

成都中院副院长曾耀林应邀出席并作开幕致辞。曾院长首先从审判质效提升、民生问题化解、社会化支持体系完善、管理人队伍建设四个方面介绍了 2024 年成都法院系统破产审判工作情况。针对管理人队伍，曾院长明确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管理人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重视党组织建设，打造政治坚定的管理人队伍；二要深入骨髓讲廉洁，针对管理人违法违规履职情况，协会要发挥行业规范和自律监督作用，管理人机构要自觉接受监督，共建廉洁行业基石，促进可持续发展；三要统筹大局讲团结，增强服务大局责任感，从法律共同体角度重视行业团结，先进要带动后进，协会要发挥传帮带作用；四要昂首阔步走出去，管理人机构要坚持高标准，提升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打造行业响亮品牌。

会长李正国发表了致辞。他回顾了协会自 2017 年成立以来，在成都中院指导下的发展历程。过去一年，协会通过培训、交流等多项举措取得显著成效，进一步充实扩大了管理人队伍。李正国提出以实践、合作、自律、专业为导向，促进管理人队伍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为地方经济建设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会上，成都中院副院长曾耀林、成都破产法庭庭长马丽莎作为颁奖嘉宾，副会长胡庆治、兰英宣读协会表彰文件，表彰了 2023—2024 年度优秀个人会员、2023—2024 年度优秀机构会员、2023—2024 年度十大典型破产案例、2022-2023 年度十大破产衍生诉讼案例。副会长兼秘书长牛建国为点破云颁发“管理人好助手”荣誉称号，以表彰其在破产管理领域的卓越贡献。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前资深法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章恒筑以“管理人对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方法和法律责任”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围绕管理人对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方法和法律责任展开，通过案例分析、法律依据梳理、问题剖析及对策思考，全面探讨破产重整领域相关议题，旨在提升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效率与降低管理人风险。

监事长王春生以“破产程序中债权人监督权行使边界”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聚焦破产程序中债权人“监督权”行使边界，从债权人监督需求、不当行使表现出发，提出多方面规制建议，旨在平衡债权人权益与管理人履职保障，推动破产程序公正高效运行。

副会长兼秘书长牛建国以“民法典中的‘破事’”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他指出破产案件不仅关乎营商环境的优化，更是国家经济战略布局中的核心环节，“破人”任重道远。

副会长兰英以“金融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的权益保护”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围绕破产程序中金融债权人权利保护展开，剖析其面临的现状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权利平衡与保护策略，旨在为金融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指导与借鉴。

副会长王鑫以“大型破产项目中管理人面临的挑战”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围绕大型重整项目中管理人履职面临的挑战展开，通过剖析债务重组市场现状，深入阐述管理人在各环节面临的困境，为理解和应对相关问题提供全面参考。

西南交通大学法学副教授魏琼以“房企破产程序中购房人取回权的认定规则研究”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她指出，房企破产程序中，买受人行使取回权将导致破产财团的直接减少从而可能使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受损，因此需严格审查买受人是否满足一般取回权的要件，依法协调买受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北京中企华评估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高文忠以“重大破产项目评估的要领及注意事项”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围绕重大破产项目评估展开，系统阐述评估要素、价值类型、估算途径、不同视角评估要点及关注事项，为破产项目评估提供专业指导。

四川省公证协会党委委员，成都市中大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伍俊杰以“公证在企业破产重整中的价值与应用”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围绕重大破产项目评估展开，系统阐述评估要素、价值类型、估算途径、不同视角评估要点及关注

事项，为破产项目评估提供专业指导。

副会长蔡斌以“房企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管理人职责边界”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聚焦房企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管理人职责边界，从法律规定切入，剖析实践误区，厘清与行政监管关系、职责划分原则，并提出履职实践建议，旨在规范管理人行为、促进房企重整有序推进。

对话交流环节第一单元“破产涉税问题”由副会长胡庆治主持。参与对话的嘉宾有：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静，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成都市税务局法规处处长李玲，副监事长李力，清算委员会主任曾传辉，房地产专委会主任曹昊辰，副秘书长黄央，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伍春澍。

对话交流环节第二单元“重整计划监督问题”由监事长王春生主持。参与对话的嘉宾有：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重庆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重庆海川企业清算有限公司董事长韦忠语，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黎莎，重庆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涌，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员额法官寇泉立，副秘书长柏艳梅，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蒋雪萍，成都竞择破产清算事务所常服律师李晨菊。

对话交流环节第三单元“司法招商问题”由副会长兼秘书长牛建国主持。参与对话的嘉宾有：江苏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张宇坤，佛山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陈刚，泉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万海龙，佛山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景平，自贡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边华伦，成都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府院联动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李耀辉，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由文强。

会议最后，成都点破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娟、阿里资产西区业务总监罗涛联合发布成都年度破产大数据排行榜。就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破产管理效率以及破产企业资产处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进一步提高破产案件办理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质量，为提升破产办理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天府新区税务局副局长徐琳；蒲江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高红城，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陈琴，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史琳，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法院花源法庭庭长黄林，邛崃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杨润莉，简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张杰；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政策法规处公职律师宋佳琦，国家税务总局四川天府新区税务局法制科公职律师刘恒，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龙泉驿区税务局法制科公职律师李世熙出席会议。

成都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成燕、周健出席会议。绵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段俊强、秘书长陈琳，自贡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殷湧，泸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秘书长喻秋红，德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李强、秘书长丁嘉、副会长苟小竹，遂宁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秘书长黄坤、副会长余敏，内江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官忠全、秘书长张力骁，乐山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徐洪、秘书长黄佳，资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秘书长梁小梅、副会长李春阳，宜宾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罗雪松、秘书长蒋开元，南充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代表侯垠、秘书长陈思宇，眉山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李琦，达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专职秘书赵子杰，雅安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赵纪川、副会长杨武，广安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秘书长杨婷婷、副会长雷加林，巴中市破产管理人协会执行会长邓江贵、秘书长谢宇皓，凉山州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杨燕飞、秘书长李卫，攀枝花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车龙、副会长王胡茂出席会议。协会两百余名会员出席会议。

《法治日报》重点报道：上海浦东法院打造支持破产重整全流程制度链条，精准施策助“危机”企业寻“新机”

● 信息来源：上海浦东法院

日期：2025 年 1 月 3 日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Wo55LQF5C8A-LJ1M46-0w>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办理破产适用浦东新区法规情况报告（2022 年-2024 年）》，报告称，三年来浦东法院共审结破产、强制清算案件及其衍生诉讼案件 2631 件。

据悉，2022 年 1 月，浦东法院挂牌成立全国首个直辖市基层法院破产审判庭，正式开启了对破产审判工作的创新探索，并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在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市场资源高效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破产审判是帮助企业‘绝境逢生’的重要方式，是保护企业主、债权人等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也是以司法审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路径，在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推动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浦东法院副院长俞巍说，“浦东法院紧紧围绕上海‘五个中心’的核心区建设和浦东引领区建设大局，不断推进破产审判工作现代化，积极回应市场主体司法需求，提升破产案件办理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 从无到有

“浦东作为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引领区，企业集聚效应显著，激烈的企业竞争环境对破产企业的救治和清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法治需求。”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负责人徐劲草说，“浦东法院成立破产审判庭，积极探索破产审判工作的发展前路，不仅源于浦东新区不断改革创新的内生要求，也源于企业对破产司法保护的外在需要。”

据介绍，2021 年 6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浦东改革创新实践需要，遵循宪法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浦东新区实施。

在此背景下，上海围绕企业破产保护作出了一系列创新探索，在同年 11 月出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浦东法院破产审判的机构设立、案件管辖等环节作了明确规定，系统性地优化了“困境企业救治机制”，率先全面打造支持破产重整的全流程制度链条，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也应运而生。此后，浦东法院大力贯彻实施《规定》，坚持制度创新，不断降低企业退出成本，帮助企业解决生存难题。同时强化破产审判人才的业务学习，加强新型、疑难及前瞻性问题研究，高水平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经过近三年的司法实践，浦东法院的各项创新实施效果逐步显现，适用率逐年上升，针对性逐步提高，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破产审判影响力不断增强。

● 起死回生

“哪怕拿不到钱，我也要让企业破产！”上海一家面临重重危机的民营企业因拖欠工资，被前员工汪某申请破产清算。

一边是走到“生死边缘”、涉及诸多员工生计的民营小微企业，一边是捍卫自身权益的维权者，浦东法院裁定受理后，先行适用简易程序并积极督促破产管理人开展财产调查，并先后与债权人、债务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沟通。经过一系列工作，汪某最终与企业达成和解协议，并顺利拿到清偿款项，公司也得以“起死回生”。

“破产审判如同治病救人，是让破产企业脱困重生还是有序退出，需要精准施策，以预防和避免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徐劲草告诉记者，三年来，浦东法院强化制度创新，提升审判质效。面对尚有生机的企业，浦东法院充分运用执破衔接、全流程网上办案平台，促进重整和解贯穿破产案件办理全流程。如某科技公司因未按期履行民事调解书中的还款义务且无财产可供执行，被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债权人申请该公司破产清算。浦东法院指导管理人挖掘并审慎评估某科技公司发明专利等技术性资产的市场价值，适时将破产清算转为重整，并在重整过程中适用《规定》的重整保护制度，审慎认定 2 名恶意不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失权，为高新技术企业破局重生提供司法支持。

对于需要清退的企业，浦东法院则构建快速退出通道，对符合条件的简单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降低企业退出成本；探索破产财产查控、解封、处置新路径，授权破产管理人可先行处置破产财产，后依据法院文书办理解封和资

产过户、移交手续，极大提升破产财产变现成效，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让企业有序退出。

此外，浦东法院还全面构建破产管理人履职监督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对管理人的激励和惩戒作用，并进一步明确管理人提名条件和审查要素，完善人案适配的管理人选任机制，支持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实现新突破。

记者了解到，反映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工作的《创新企业破产府院协调和破产审判机制》成功入选首批引领区改革创新案例，浦东法院在对浦东法规创新制度不断探索研究的基础上，陆续形成了一批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 浦东模式

2024年11月，浦东法院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办理破产适用浦东新区法规的实施规则（四）》，就如何实现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有效衔接，提升企业救治成效进行了细化规定。在此之前，浦东法院已先后发布了三个适用《规定》的实施细则，分别对破产重整保护、破产管理人个案履职评价、破产管理人提名和审查流程等工作作了细化规定，进一步优化创新制度的适用，推动创新制度落实落地。

三年来，浦东法院一直致力于探索形成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的符合引领区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破产办理“浦东模式”，服务改革发展大局，护航上海法治化建设；积极参与《规定》的立法和修订工作，指定专人参加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法工作专班，参与拟定部分法规条款，并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推进浦东法院破产审判体制机制改革工作。

此外，浦东法院还支持配合市、区两级人大开展专项调研和立法评估工作，结合实践中的新问题、新形势对《规定》提出修改完善建议，推动《规定》修改纳入市人大五年立法规划，为进一步完善破产法律制度贡献力量。

据了解，在2023年，浦东法院就有多项机制、制度分别入选首批引领区改革创新案例、2013-202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100个典型案例、2023年度上海法院十大创新工作成果等，为优化完善企业破产制度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浦东经验”。“破产审判帮助‘危机’企业寻‘新机’，助力市场发展增活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浦东法院将继续探索创新更多的新机

制、新规则、新样本，以更强的责任担当、更优的审执举措、更大的推进力度，努力为上海营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司法之力。”俞巍说。

上海三中院（知产法院、铁路中院）举办破产审判实务培训、“三味·上知学苑”2025年知识产权审判专题业务培训

- 信息来源：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日期：2025年1月3日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wTENH-CImnn_ga6xEknGg

1月3日上午，上海三中院（知产法院、铁路中院）举行破产审判实务培训动员会暨首场培训会，党组书记、院长席建林作动员讲话，党组成员、副院长俞秋玮授课，党组成员、副院长钟明，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潘云波出席。破产庭与执行局全体干警参加。

席建林院长指出，破产审判工作要在“七个并重”上发力。一要在审判能力上，做到“专”与“博”并重；二要在裁判方法上，做到“刚”与“柔”并重；三要在审理效果上，做到“急”与“缓”并重；四要在审判力量上，做到“内”与“外”并重；五要在审判作风上，做到“清”与“亲”并重；六要在机制创新上，做到“立”与“破”并重；七要在沟通方式上，做到“听”与“说”并重。持续破解破产审判实务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努力培育破产审判标杆地。

俞秋玮副院长以“破产法的美丽世界”为题，从服务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资源优化再配置、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八个方面阐述了破产审判的功能。从更加注重发挥破产制度独特功能作用的理念、平衡把握程序效率与公正关系、提升专业化能力三方面讲述了如何提升破产质效。勉励同志们在破产审判事业上精耕细作、追求卓越，推动破产审判工作始终走在前列。

同日下午，上海知产法院“三味·上知学苑”2025年知识产权审判专题业务培训开班。党组书记、院长席建林作动员讲话，党组成员、副院长刘军华主持，高院知产庭部分法官和法官助理、基层法院部分干警代表及上海知产法院相关庭室全体干警在现场参加，全市基层法院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部分干警以视频方式参加。

席建林院长指出：一要学好基本原理，这是基础。办好知识产权案件，既依赖社会常识，更要深刻把握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理。二要领悟审判理念，这

是关键。要注重平衡思维，平衡好自由竞争与反垄断、人才流动与商业秘密保护、个人发明与职务发明、维权牟利与惩罚性赔偿之间的关系。三要把握裁判方法，这是核心。既要有国家情怀，也要有国际视野。对涉新兴技术、标准必要专利等重大案件，要加强研究、审慎处理，力争形成上知规则、上海规则、乃至中国规则，努力培育知产审判优选地。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迁以“著作权法基本原理：作品的认定”为题，结合“人工智能文生图第一案”“《月光》舞蹈图片侵权案”“《华清浴妃图》著作权侵权案”“上帝之手雕塑案”等国内外案例，深入阐释了知识产权“专有权”含义，全面剖析了关于独创性的认定、不同类型作品的表达性要素认定等审判实务中的疑难问题。

上海三中院（知产法院、铁路中院）管辖的案件涉及营商环境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法治政府建设、美丽上海建设等方面，经常面对司法领域的首案、疑难案、大要案，为此，上海三中院（知产法院、铁路中院）把业务能力建设作为队伍建设的重点，新年伊始，即组织开展破产、知产审判专题业务培训，通过提升专业能力，推动审判质效提升，为做优四项功能、培育四个高地打下坚实基础。

|

聚焦企业、学校、医院等主体注销规范——这场研讨会讲透实务要点

● 信息来源：上海市破产管理人协会

日期：2025 年 1 月 7 日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6mTKqzeWOHglILEvOBA4Q>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下午，市管协强制清算业务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强清委”）和破产清算业务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破清委”）联合举办“企业、学校、医院等主体注销规范”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强清委主任文春生律师，副主任陈鹏律师、马荣律师，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裔沁玮律师，强清委委员、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颖律师做主题分享。会议由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桐律师主持，各管理人机构团队成员及预备会员 90 余人参加了学习。会上，文春生主任就私立医院注销相关问题作了详尽的解析，深入探讨了私立医院注销的法律规范和流程，从民法典和公司法两个角度阐述私立医院的法律主体地位，介绍了私立医院的强制清算、破产清算流程及注销流程和行政管理要求。

陈鹏副主任详细阐述了民办学校注销的法律依据、流程及常见问题。他表示，民办学校注销需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成立清算组、财务清算、清偿学生和教职工的权益等。陈律师特别强调，在注销前应进行全面的法律审查，确保所有债权债务关系清晰明了，并妥善安置好教师和学生，同时严格遵守相关程序，以有效防范法律风险。

马荣副主任就国有企业注销的有关问题做主题分享。她首先概述了国企改革历程及国有资本 6 种退出途径，介绍了新《公司法》对工商登记、解散清算及国有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随后，马律师总结了国有企业清算要点，包括前置程序、清产核资及资产处置，并结合实际案例，指出国有企业注销过程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裔沁玮律师结合自身经验，介绍了企业注销过程中的税务和工商的堵点和难点，特别是税务注销中的非正常户解除、清算所得税汇算清缴以及工商注销中分支机构和对外投资清理等复杂疑难问题。

杨颖律师主要介绍了破产清算企业税务注销的法律依据和实际操作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重点讨论了死欠核销的概念和程序，并针对不同税务情况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在自由交流环节中，卫一鸣律师提出了僵尸企业注销的实务难题，并分享了他的见解和思考。这一话题立刻引发了与会委员们的热烈讨论和深入思考。大家纷纷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最后，文春生主任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并期望各位委员能够继续保持交流合作的热情，携手共进，共同发挥研究会的作用，为解决破产实务中的难题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聚焦两会|| 破产法治好声音③：加强审执衔接有效性，提升破产审判质效

● 信息来源：四川省破产管理人协会

日期：2025 年 1 月 23 日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gLA3dtvGsBISuSsatPefw>

日前，四川省、市两会陆续召开，期间，协会会员单位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有关破产法治建设纷纷建言献策，为“破”发声。协会将陆续推送会员单位代表委员们的破产法治之声合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代表、委员们都说了什么吧！

加强审执衔接有效性，提升破产审判质效

《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这一规定旨在确保破产程序的统一性与公正性，防止个别债权人在破产程序启动后通过保全与执行措施抢先受偿，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公平清偿权益，维护破产企业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

“《企业破产法》立法本意无疑是为了营造有序的破产法治环境，但在司法实践中，破产程序中止执行和解除保全因缺乏明确的法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和工作规范等的指引，缺少时限要求，执行法院与破产管理人之间未建立良性沟通机制等，遭遇了保全措施解除困难、执行程序中止不顺畅、管理人职责履行受限等诸多困境。”今年省两会期间，四川省人大代表、省律师协会副监事长、四川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专家顾问、发现律师事务所主任罗毅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强审执衔接有效性，提升破产审判质效的建议”。

罗毅律师建议，加强法院内部的有效衔接。破产案件受理法院应当向已知执行机关发出中止执行的通知，并附破产受理裁定。执行机关收到通知或知悉破产申请受理后，应当立即中止执行。执行法院继续执行债务人财产的，破产案件受理法院有权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回转。

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法院、行政机关、金融机构等多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确保破产程序中保全措施和执行程序的及时解除或中止。

明确人民法院接收破产管理人文书的回复制度。执行法院在收到管理人寄送的《解除保全申请书》《中止执行告知函》等材料后，应及时制作电子送达回执单，通过破产管理人预留的联系方式进行送达，告知破产管理人已经接收到管理人寄送的材料。在执行法院向破产管理人发送电子送达回执单的同时，建议执行法院就执行案件的法官信息、联系方式等一并向破产管理人进行告知，以便破产管理人后续与承办执行法官沟通解除、中止的推进情况。

明确解除保全和中止执行的时限要求。以工作规范的形式，在人民法院内部明确要求，在收到破产管理人或破产法院的破产受理裁定、《解除保全申请书》《中止执行告知函》等相关材料后，应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破产企业被执行资产的保全解除和执行中止，该时限以五至八个工作日为宜。

构建人民法院与破产管理人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建议人民法院在内部确定以某一执行法官或法官助理作为与破产管理人的常态化联系人，并公开明确联系方式，各破产管理人可定向与该联系人寄送文书、获取执行法官联系方式、确认解除保全及中止执行进度，提升执行法院与破产管理人之间的沟通效率和执行法院执行工作效率。同时，执行法院也可以通过常态化联系人机制，获取破产管理人工作需求，统一收集破产案件进展信息，为执行法院破产案件工作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安徽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与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工作交流会

● 信息来源：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

日期：2025 年 1 月 22 日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nYTI942Mt0GqaEBusdAmA>

2025 年 1 月 22 日上午，安徽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唐民松、党支部书记兼副会长朱金宏、副会长李静、府院联动机制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金星亮、财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辉、副秘书长葛瑞琦、秘书洪燕等到访我会。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朱征夫、专职副会长沈敏、副秘书长郑飞虎等出席了本次会议。朱征夫会长代表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对安徽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在播放协会宣传片的同时介绍了我会的基本情况、成员构成及组织架构。朱会长就协会发展现状，重点介绍了我会与中信集团组成联合舰队全面参与大湾区企业重整中心建设情况，“跨境破产法国际论坛”会议筹备情况和大湾区企业庭外重组中心建设的推进工作情况。

沈敏专职副会长详细介绍了秘书处工作机制、协会章程修订、广东省破产企业重整投资基金和管理人扶助基金等情况，说明了企业重整中投资资金的核心功能，以及管理人扶助基金对提高协会会员办案积极性的重要作用。郑飞虎副秘书长介绍了协会党组织设置以及党的建设、党组织活动开展情况。协会成立党建工作小组加强了管理人行业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推动了管理人行业党建工作持续向纵深发展，建设了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党同心同向的高素质管理人队伍，推动了广东省破产管理人队伍的规范健康发展。

安徽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唐民松对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表示感谢，介绍了安徽省破产管理人协会党建情况、机构运行以及府院联动常设机制等情况，希望通过此次考察交流加强两会联系、促进交流合作。

在自由交流环节中，双方围绕多个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而高效的深入讨论。其中，府院联动机制的建设成为交流的重点，双方详细探讨了这一机制在促进破产管理人与政府机构协同工作、共同应对和解决履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出困难等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此外，双方还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创新方式方法，优化路径设计，以更有效地利用府院联动机制提升破产案件处理效率和质量。座谈结束后，我会与安徽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互赠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此次交流加深了粤皖两地破产管理人协会之间的友谊,为双方在破产管理领域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两会将持续加强沟通协作,共同推动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携手促进两地经济环境的优化与提升。

北京市破产法学会举办 2024 年度学术会议暨三届五次会员大会

- 信息来源：北京市破产法学会 日期：2025 年 1 月 15 日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ZoKsPTCa4yERcoDyEgJ5w>

2024 年 12 月 29 日，北京市破产法学会 2024 年度学术会议暨三届五次会员大会在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审判委员会原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杜万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北京市破产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军应邀参会并发表主题演讲，北京市破产法学会名誉会长王欣新教授发表新年寄语。本次会议的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市破产法学会会长徐阳光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对本次活动提供协办支持。北京市法学会联络部副主任程露茜，学会顾问伍彪，学会副会长石静霞、高丝敏、王斐民、沈小英、常洁、文建秀、李国慧、禹华初、徐光明、袁定波、尹正友、曹春烨，监事长康阳，秘书长王玲芳以及学会 200 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分为学术年会主题报告、三届五次会员大会和三届七次理事会会议和迎新年茶话会等环节。

一、学术年会主题报告

本次会议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北京市破产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军和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审判委员会原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杜万华先后作年度主题报告，北京市破产法学会会长徐阳光主持本环节。

李永军老师在年度主题报告会暨“破产法前沿系列讲座”第 68 期发表了题为“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司法解释解读”的精彩报告。李永军老师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尊重立法原意、尊重学理意见、立足现实需要、保留法律一致性等原则制定了民法典合同编的通则部分司法解释。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司法解释通过法律解释与漏洞填补的科学方法，对合同编通则部分及与之存在体系关联的合同规则进行细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合同编的相关规则。李永军老师结合合同成立、效力、履行、变更等阶段可能存在的事实认定困难与法律漏洞，通过

以案说法的方式解读了相应的司法解释条文，并对《民法典》意义上的“习惯”在现实法律纠纷解决中的作用进行了解读。

杜万华老师在年度主题报告会暨“破产法前沿系列讲座”第69期发表了题为“完善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的演讲。杜万华老师认为，构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时首先应重视产权保护，其次需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破产和市场退出制度以及市场交易制度。破产制度改革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判定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要通过破产制度改革，推动国有资本的集中和民营企业迈向现代企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深度开放，推进我国市场生产要素的畅通流动。我国社会主义破产制度的本质应是保护性的法律制度，建议从建立完整体系保护多重主体、探索建立个人财产制度、建立三大辅助制度完善破产程序、加强破产法律文化助推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来构建并完善我国的破产保护法律体系。

二、三届五次会员大会

北京市破产法学会第三届会员大会第五次会议，由北京市破产法学会秘书长王玲芳主持。

徐阳光会长代表理事会作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工作报告。回顾2024年，第十五届中国破产法论坛顺利召开，“破产法文库”继续推出理论与实务新作，为破产法的学术研究贡献了高质量的成果。学会在2024年联合人大破产法研究中心举办了10期破产法前沿系列讲座，破产法专家学者登台演讲，精彩纷呈；学会承担了北京市发改委委托的营商环境法律咨询服务项目，并参与编写北京市营商环境发展报告；学会成员积极参与企业破产法修改立法工作，还承接了厦门市人大常委会的委托立法项目，起草了《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草案)》，并与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合作开展了两个研究项目。在国际交流方面，学会成员王欣新、石静霞、高丝敏、宁韬、王玲芳、王斐民、郑志斌、许胜锋等人积极参与联合国贸法会第五工作组会议、东亚破产论坛、亚洲破产法改革论坛等国际会议，在国际舞台发出了中国声音。展望2025年，学会将继续秉承学术、包容、公益、共享的理念，在北京市法学会的指导下，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建设，积极投身于破产法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服务首都和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破产法治事业和法治中国建设。

徐阳光会长还向会员大会作了财务工作报告。学会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团体会员的会费收入、协办单位提供的专项协办经费以及北京市法学会提供的专项

经费补助，感谢北京市法学会的支持，感谢全体团体会员单位、论坛协办单位为学会所作的贡献。

康阳监事长代表监事会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监事会密切关注学会的各项工作，对学会成员开展活动及违反纪律情况的进行监督，确保活动的合规性和有效性，为学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监督保障；监事会严格执行学会的规章制度，对成员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督，确保了学会内部的纪律性和专业性；监事会对北京市破产法学会财务情况的细致审查，确保了财务的透明和合规，为学会的稳定运作提供了坚实的财务基础。新的一年，监事会将继续主动履职，进一步加强对学会活动的监督，确保学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监事会将不断优化工作机制，提高监督效能，为学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本次会议大会审议通过了理事增补人选，并聘请杜万华老师担任北京市破产法学会顾问，徐阳光会长代表学会颁发聘书。

三、三届七次理事会会议

理事会会议由王玲芳秘书长主持。徐阳光会长向会员大会介绍拟增补的个人会员、团体会员、常务理事、副会长。三届七次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增补名单，增补雷鸿、季诺、许胜锋为学会副会长，增补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等六家中介机构为团体会员单位。同时还增补了部分个人会员、理事和常务理事。徐阳光会长表示，新增补的会员、理事、常务理事及副会长将为学会注入新的活力，学会对新成员的加入表示热烈欢迎，并期待他们在未来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推动北京市破产法学会的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法学会联络部副主任程露茜代表北京市法学会对学会年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她指出，第十五届中国破产法论坛的成功举办获得了业界的广泛好评，破产法文库著作的持续出版，为理论成果和实务经验提供了高端平台，进一步丰富了破产法领域的学术资源；学会在立法、司法、管理服务领域及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此外，徐阳光会长作为全国法学会系统先进个人入选，将在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受到表彰，这也是属于学会的荣誉。希望北京市破产法学会做好未来工作规划，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建引领，健全组织制度，服务广大会员，在 2025 年取得更好成绩。

学会名誉会长王欣新教授发表新年寄语。王老师回顾了第十五届中国破产法论坛的成功举办，强调了论坛在参与人数和学术影响力上的突出表现，对大家破产法研究和实务工作中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认可。学会在 2024 年贯彻落实法治思想，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致力于研究“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个人破产制度”。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祝愿学会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发展，取得更好成果。

活动最后，秘书处邀请到著名书法家朱重兴老师现场写春联、送祝福，全体参会成员还进行了轻松愉快的抽奖环节和新年茶话会。活动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圆满结束，让我们共同迎接充满希望的 2025 年。

对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新规热点问题的思考

● 信息来源：法律适用

作者：贺丹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0dmIM9kid2JoD6t9jJfNg>

近日，在破产业界热度最高的话题，莫过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联合印发的《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24〕309 号，以下简称《2024 年上市公司重整纪要》）这一新规。《2024 年上市公司重整纪要》取代了此前《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2〕261 号，以下简称《2012 年纪要》），成为上市公司重整的重要实践规则。证监会同日发布了配套规则的征求意见稿《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征求意见稿）》。上市公司重整因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牵涉资本市场秩序一直广受关注。此次新规的发布，回应了资本市场环境、我国上市公司重整实践以及监管政策的新发展，有诸多值得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和亮点。

一、司法审理与证券监管的协作机制

上市公司重整涉及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协调配合，其核心是法院与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对此，《2024 年上市公司重整纪要》延续了此前《2012 年会议纪要》中的协作机制，也作出了一些完善。目前纪要中的协作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在重整申请审查阶段的协作。这一阶段中，上市公司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同步向证监会通报情况，证监会应当就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等事项向省级人民政府出具意见，并同步通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重整申请受理审查的听证中，涉及证券监管事项的，应当听取属地证监会派出机构意见。二是在重整计划草案批准过程中的协作。法院在审查重整计划草案时，应重点审查重整计划内容以及重整投资人资格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国家产业政策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等相关规定，必要时可以征求属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的意见。三是违法违规行为的重大事项通报机制。《2024 年上市公司重整纪要》要求，证券监管部门和法院在发现上市公司或者破产程序参与者存在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时，应根据纪要确定的程序相互通报，必要时可启动会商机制。四是关于退市公司重整案件办理的协作机制。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与退市公司住所地人民政府、证监会派出机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加强协作，必要时可以专门会商。此次纪要引入了财务顾问机制，上市公司或者管理人可以聘请证券公司担任财务

顾问，熟悉资本市场规则的财务顾问可能使重整计划设计更符合市场监管要求，从而促进协同效率。同时，为维护社会稳定，人民法院在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审理中，也要积极配合政府做好上市公司重整中的维稳工作，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风险预警、部门联动、资金保障等协调机制的作用。《2024 年上市公司重整纪要》也延续了此前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出具维稳预案，以及地方法院在受理案件前将审查意见及相关材料逐级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的做法。这一做法，能够实现受理标准的审慎与统一，但也会影响上市公司重整的启动效率。拥有重整申请权的上市公司、出资人、债权人可能无法把握重整的启动时机，导致重整时机的延误。

二、对上市公司“壳资源”重整的限制

《2024 年上市公司重整纪要》的多项规则设计中，隐含着一种期待：上市公司重整程序应当用于有实际重整价值的企业拯救，重整程序不应成为单纯依靠“壳资源”价值的概念重整。这种期待在重整价值识别、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与通过以及重整计划的执行等相关规则中均有体现。这一期待在 2024 年 4 月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中有更清晰的表述：“大力削减‘壳’资源价值。一是加强重组监管，强化主业相关性，严把注入资产质量关，防止低效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从严监管重组上市，严格落实‘借壳等同 IPO’要求；严格监管风险警示板（ST 股、*ST 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二是加强收购监管，压实中介机构责任，严把收购人资格、收购资金来源，规范控制权交易。三是从严打击‘炒壳’背后的市场操纵、内幕交易行为，维护交易秩序。四是对于不具有重整价值的公司，坚决出清。”交易所随之修改股票上市规则，严格了交易指标类、财务指标类、规范运作类、重大违法类四类强制退市标准。严格的退市规定将使一部分“上市公司”重整转变为“退市公司”重整。此次纪要对于上市公司重整申请审查过程中的重整价值认定也反映了这一思路。《2024 上市公司重整纪要》第 9 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不具备作为上市公司的重整价值：（1）上市公司因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可能被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的重大违法行为正在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尚未结案；（2）根据相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等情况，上市公司可能被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3）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规范运作等存在重大缺陷，可能被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4）其他违反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导致上市公司丧失重整价值的情形。”上述规则引入了交易所重大违法类退市标准的

规定，也确定了明确的上市公司重整价值认定的“否定性标准”。值得思考的是，当《2024 上市公司重整纪要》将“可能被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作为重整价值判断标准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强化了上市资质具有重整价值的判断。同时，根据交易所上市规则，交易所可以根据公司重大违法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程度，结合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类型、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上市地位的影响程度等情形，对公司股票是否应当终止上市作出决定。这样一来，对出现违法行为的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实际上不再是各利益相关者或者司法机关的判断结果，而是由交易所决定。另外，“不具备作为上市公司的重整价值”不等于公司没有重整价值。但在严格的上市公司重整启动程序下，存在这些情况的上市公司无法进入重整程序，只能在其退市后启动重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重整程序的启动效率。

三、投资者权益保护

投资者权益保护是《2024 年上市公司重整纪要》中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这里被着重考量的投资者权益主要是公众股东的权益保护。在范围上不仅包含了现有的投资人，也包含未来的潜在投资人。现有公众股东权益在上市公司重整的情况下被称为出资人权益。上市公司重整中的出资人权益问题对上市公司重整实践有着重大影响。根据公司法一般理论，公司清算时，股东应在清偿债权人之后方可获得剩余资产分配。债权人的清偿顺位高于股东。按照这一逻辑，在债权人得不到清偿的情况下，股东不应保有出资人权益。但由于这一清偿顺位规则并未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写明，公众股东往往主张其仍应保有公司股份权益。在公司重整的情况下，公司存续价值的估值困难也加剧了出资人权益调整的难度。因此，我国上市公司重整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一直是一个难题。早期的原股东让渡股份的实践引发了争议，并逐渐转化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做法。此次《2024 年上市公司重整纪要》试图弥补这一不足，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普通债权人不能在重整计划中全额获得清偿的，原则上应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因违法违规对上市公司造成损害的，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时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支配的原有股权作相应调整。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重申了上市公司重整的绝对优先规则。但另外两项规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一规则的实施。一是出资人表决的要求，自《2012 年纪要》起，出资人组的表决便需要参与表决的出资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如果上市公司股权分散，该组表决较难通过。二是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征求意见稿）》第7条中对重整转增股份数量的限制，即“资本公积金转增比例不得超过每十股转增十五股”。该规定意在避免股本过度扩张稀释中小股东权益，会限制出资人权益调整的程度。实际上，企业重整后的价值是原有股东权益可以获得保障程度的标尺。但由于这一价值在重整当时难以获得准确估值，境外市场往往采用在重整计划中通过多种证券工具配合，实现原股东、债权人与重整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均衡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其主要做法包括，通过赋予原股东期权的方式保障其享有未来重整成功的企业价值的可能，或者通过优先股、可转债等方式实现对重整投资人、债权人的权益保护。这些调整也可与出售式重整相配合。资本市场监管可以考虑为这些调整方式留有空间。

四、信息披露问题

证券市场高度依赖信息。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石。由于在上市公司实施预重整、重整、和解、破产清算期间，原则上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不停牌，此时相关破产事项的及时准确披露对市场交易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交易所上市规则对重整期间的信息披露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预重整等事项，仅规定参照破产事项规定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此次《2024年上市公司重整纪要》用“庭外重组”概念代替了“预重整”制度，这一概念变化将此前未纳入司法预重整的庭外重组也包含在信息披露范围内，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然而，将所有庭外重组均包含在信息披露范围内，还需要更细致的制度设计，庭外重组的优势之一是其可以在较私密的情况下完成企业拯救，庭外重组的信息为市场知悉后，有可能会损害上市公司价值，导致债务重组失败。这时，过早的信息披露不利于利益相关者。因此，对于未进入重整程序或者司法预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应当许可发行人在一定期间内延迟披露其债务重组谈判事项。但这一延迟披露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延迟披露不会给市场造成误导。也就是在债务重组进行的当时，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市场预期与发行人的真实状况不存在较大差别，市场主体并不会因发行人暂时未公开债务重组信息而受到损害。二是债务重组信息被严格保密。此时债务重组信息的知情人在债务重组内幕信息公开前，对其所知悉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据此买卖股票，也不得泄露此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股票。除上述方面外，《2024年上市公司重整纪要》还在重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制定了细致的规范。这些规范为一些实务中存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规则指引，也为未来的上市公司重整实践提供了更多的探索可能。

探索信托在破产程序中的价值和作用

- 信息来源：中国破产法论坛 作者：杨圣韬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zUD41FbbUagfLztHdsC0w>

摘要：

如何提高破产财产的处置价值并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是破产制度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近年来出现的全新市场化破产财产处置工具，信托已经在多起案件中利用其独特的制度优势，从破产财产的变价率和处置效率两方面有效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取得了良好的破产财产处置效果。但是作为一种新兴工具，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定位和适用场景不明确、法律制度和治理架构不完善以及受托人管理能力不足等仍需要后续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破产制度是一种在司法程序主导下，将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的债务人的财产公平清偿给债权人或者对债务人予以财务拯救的有秩序的文明的商业安排[1]，具有集体概括性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独特功能。在破产制度体系下，破产程序之所以将债权人等众多破产利害关系人共同参与其中，是因为其能够通过破产财产变价分配，实现全体债权人债权利益公平受偿。因此，作为破产财产程序的重要环节之一，破产财产的处置成效直接关系着破产制度在市场主体拯救和退出机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8 年发布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也要求人民法院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破产财产处置方式和渠道[2]。通过进一步提高破产财产的处置效果，破产案件可实现依法高效审理，这对于破产制度作用充分发挥、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在诸多影响破产财产处置效果的因素中，是否有效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评判标准。在诸多破产财产处置方式中，信托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制度，近年来已逐渐被关注并被成功运用在多起破产案件中，有效促进破产财产处置价值的提升。本文结合实践案例，阐述在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下，信托在破产程序中的价值和作用。

一、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的内涵和阻碍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 2004 年颁布的《破产法立法指南·第一部分》（以下简称“《立法指南》”）中，将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等八项关键目标确立为建立有效力和高效率的破产法的关键目标和结构[3]。世界银行在 2023 年公布的新一版营商环境评估体系（Business Ready，以下简称“B-Ready”）的《方法论手册》中也指出，破产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对于运作良好的破产法律制度而言，有关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的条款是其核心之所在[4]。

具体到不同的破产程序，清算程序中的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侧重于将破产财产高效处置后归集的资产公平清偿予债权人，实现破产企业资产的再配置；而重整程序中，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更需要兼顾债权人的权利与破产企业营运价值保留的两方面需求。

（一）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的内涵

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涉及变价率和处置效率两方面。

首先，变价率是破产财产处置结果最直观的体现。如果破产财产处置能够充分挖掘破产财产价值，使债权人享受更高的清偿率，对于破产程序的各类债权人是极为有利的。

其次，处置效率会影响破产财产的处置成本。如果破产财产处置一味追求变价率而忽视处置效率，债权人很可能会因此在时间和金钱方面付出高昂的成本。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其已经停止经营活动，财产处于冻结状态，若不及时处置，很可能会导致企业资产价值的下降或管理成本的攀升，比如生鲜产品的价值容易随着时间推移而大幅下降、大宗货物的保管需要高昂的仓储成本等，显然不符合破产财产处置价值的最大化。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纪要》中强调，破产财产的处置在最大限度提升破产财产变价率的同时，也要兼顾处置效率[5]。除了我国的立法之外，联合国《立法指南》也指出，及时高效的破产事务管理有助于破产财产最大化原则的落实[6]。世界银行 B-Ready 也在“破产程序的审结效率”指标中特别关注企业在破产程序中所耗费成本和时间等问题[7]，指出对于清算程序而言，高效的破产程序有助于快速清退淘汰企业、鼓励新的商业活动的开展；对于重整程序而言，冗长低效的破产程序则是加剧企业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8]。

（二）阻碍破产财产处置价值最大化的因素

破产财产处置主要通过估值或市场化询价方式对破产财产价值进行发掘,从而获得一个各方认可的、合理的破产财产处置结果,主要有变价、以物抵债和债转股等方式。而作为破产企业各类型资产的集合体,破产财产的复杂程度较高,涵盖了货币、实物、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用益物权等财产和财产权益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财产和财产性权益[9],使得实践中破产财产的处置常常会因为种种因素而阻碍处置价值的最大化。

1.因素一:瑕疵破产财产的处置

由于破产财产的复杂性,实践中被归集为破产财产的资产往往并不是“完美”的资产,而可能存在种种瑕疵,比如尚未完工的在建工程、权属手续不完备的不动产、呆账坏账等。对于瑕疵财产的处置,实践中一般采用直接处置或先解决瑕疵再进行处置的方式,但是这两种方式都可能会导致破产财产难以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处置目标。如果采用直接处置方式,由于瑕疵破产财产可能会存在附有隐性权利负担、权属不确定等问题而降低潜在买受人的购买意愿;此外,瑕疵破产财产还可能涉及的应缴税款、应付费用等成本问题也会影响其处置价格。比如某一笔 44 万余元瑕疵债权因其可能存在诉讼时效届满等问题,在历经四次拍卖后,最终仅以 3.66 万元的价格成交[10]。

而如果管理人选择先解决瑕疵再进行处置,那么可能因瑕疵的处置而引发一系列的衍生诉讼,延长破产程序的审理时间。以 2017 年广东日之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之泉公司”)破产案件为例,日之泉公司的破产财产类型极为复杂,囊括了商标、股权、债权、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机动车、专利、不动产、应收账款等多种类型的资产。这些资产在处置过程中存在大量纠纷,严重拖累了处置效果,比如日之泉公司的 A 处土地使用权的地上建筑物为无证建筑物、B 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费用尚未支付且出让人拒绝日之泉公司向第三方拍卖转让、C 处土地使用权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11]等,并最终导致本案迄今已历时 7 年却仍未审结[12]。

2.因素二:破产财产的价值存在波动风险

破产财产的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可以通过专业评估机构确定破产财产的大致价值,其实际的处置价值仍然可能存在波动,甚至出现与评估价值想去甚远的情况。

第一，破产财产的价值可能会因为时间、地点、处置方式等各项因素而存在不确定性，且不同时点的价值可能差异较大。常规处置方式偏向于关注破产财产处置时点的价值，当破产财产处于价值低位时，管理人的处置所得价款也可能较低，影响破产财产的变价率。如上海市金山区某处在建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其2019年12月的评估价值为3.05亿元，但是2024年8月的成交价格仅为7500万元[13]。而如果管理人希望避开市场低位，在市场回暖后以相对较高的价值进行处置，则必然会导致破产程序迟迟不能终结，且这种迟延并不能保证破产财产价值必然提升，而又降低了处置效率。

第二，破产财产的处置方式也会对破产财产的价值产生影响。对一般类型的破产财产而言，不同的处置方式对其最终处置价格影响有限。但是，当涉及如知识产权、在建工程、特种设备等类型的破产财产处置时，由于此类资产的价值往往只能由真正有需求的企业才能发挥，一旦处置方式选择不当，容易引起其价值的大幅度贬损。以知识产权的处置为例，根据实践部门的调研结果，由于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变价机制，管理人往往只能通过线上拍卖平台无目标地进行网络拍卖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弊端，比如管理人为了便利，习惯将多项知识产权打包拍卖，这种方式虽然节约了拍卖成本，但是容易埋没单项知识产权的真实价值[14]。

第三，多轮拍卖对破产财产价值的影响。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特殊资产交易平台和交易规则，破产财产的拍卖会参照执行网拍的系列规则。而我国执行网拍目前采用的是有保留价的拍卖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指出，再次拍卖的起拍价降价幅度不得超过前次起拍价的百分之二十[15]。这种较高的保留价拍卖机制导致即使破产财产的评估价值和起拍价格合理，潜在的买受人在实践中也往往在前期拍卖过程中持观望的态度，以期后续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拍品，导致前期拍卖时常会发生流拍的情况，并致使最终成交价格较低。比如，苏州某公司名下的房产（在建工程）、机动车等破产财产的第四次拍卖起拍价仅为4.54亿元，而其原评估价格为7.88亿元[16]。

3.因素三：部分特殊类型资产需要特别处置

实践中，部分特殊类型资产的处置并不仅仅局限于处置行为本身，还涉及一系列附随义务。另外，部分特殊类型资产的价值需要管理人通过预先有效管理才能够充分发掘。

以烂尾楼为例，根据中央“保交房”政策的精神要求，烂尾楼的处置涉及基本民生保障，购房者的居住权益要摆在优先位置，管理人需将房屋质量和配套设施等销售承诺落实到位，不能将烂尾楼处置简单化“一卖了之”，而是需要通过有效的处置手段进行综合性处置，确保烂尾楼完成续建。此外，从变价率的角度而言，烂尾楼与商品房之间的价值差异巨大，如果管理人能够通过有效的处置手段实现复工复建，将烂尾楼转变为商品房，往往也能显著提升变价率。比如在上海某置业有限公司重整案件中，通过“公开招募共益债+委托管理”的创新处置方式，成功实现在建工程复工续建。续建完成后项目估值由10亿元提升至逾40亿元，普通债权清偿率明显提升[17]。而通过拍卖变价等常规处置手段，烂尾楼的变价率可能则相对较低，比如杭州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某楼盘在建工程，其评估价值约为1.02亿元，但拍卖成交价仅为6600万元。

4. 因素四：重整计划的执行变数

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也可能会影响破产财产的处置效果。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破产企业是重整计划的执行人[18]。对于债权人而言，破产财产处置的目的在于使其获得有效的清偿，其追求的是通过有效的处置方式实现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如果债权人认为破产财产的清算价值过低，其可能偏向于通过破产企业的重整以追求破产财产的持续经营价值。而实践中，由于不可抗力、市场环境等客观因素，以及破产企业自身的主观因素等，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往往会存在变数，并最终影响破产财产的处置成效。比如，重整投资人违反重整计划的约定，拒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则会浪费拯救破产企业宝贵的时间窗口，恶化债权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处境，形成“次生伤害”[19]。

二、引入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的可行性以及基本模式

为减少上述因素对破产财产处置成效的影响，近年来各地法院在实践中开始探索引入信托作为破产财产处置新工具的可能性。

根据《信托法》第二条规定，信托指的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对于参与破产财产处置的信托业务，原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发布了《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银保监规〔2023〕1号，以下简称“《信托业务三分类》”），将信托公司

作为受托人，为实施破产重整、和解或者清算的企业风险处置提供受托服务，设立以向企业债权人偿债为目的的信托称为企业破产服务信托[20]。

（一）信托在破产财产处置过程中的功能作用

基于破产财产最大化原则，信托制度所具有的特点可以在破产财产处置中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以提高破产财产处置效率和价值。

1.助力破产程序效率提高

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最直接的功能是可以将破产程序中债权人债权转化为信托受益权，债权人通过根据债权比例取得信托受益权而获得债权清偿。由于信托受益权是基于信托财产交付后设立的信托而产生，不需要在破产程序中完成对信托财产的具体处置，可以避免常规破产财产处置因多次流拍或估值异议而迟滞破产程序的情形，从而达到缩减破产财产变价流程时间、降低破产程序成本，有利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

2.实现破产财产风险隔离

在破产财产处置过程中，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可以实现破产财产的风险隔离。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指的是信托设立后，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受托人应当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受托人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21]。信托财产不属于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的责任财产，成为事实上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财产之外的独立的财产[22]。

基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当破产财产转化为信托财产后，对于债务人而言，通过将不宜、不便短期处置的破产财产作为信托财产设置信托，破产企业可以减轻处置负担，利用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完成资产的剥离，可将核心有效资产用于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对于债权人而言，一方面这部分财产不再是破产企业的责任财产，如果破产企业重整后经营情况依然不理想，信托财产也不会被破产企业任意处分，也能避免再被查封、冻结、扣押的风险；另一方面，这部分财产也不归受托人所有，受托人必须按信托合同的约定履行管理职责，并受到受益人大会的监督约束，故而设立信托后的专门管理有利于信托财产处置风险减少和价值最优。

3.可整体化处置破产财产

根据《信托法》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信托财产的范围广泛，只要财产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且不被法律法规所禁止流动，原则上都可以作为适格的信托财产[23]。该广泛性主要体现在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上，静态维度指的是可被用于设立信托的财产类型多样。除非法律或行政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流通外，只要财产是确定的且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无论是有形的货币、债券、不动产，还是无形的知识产权、债权等，就可以作为信托财产。动态维度则强调除了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财产是信托财产外，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也归入信托财产。比如，委托人将其持有的 100 万元现金作为财产设立信托后，除了 100 万元成为信托财产外，受托人将 100 万元用于购买债券所获取的利息也属于信托财产。因此，信托财产范围的广泛性确保了信托计划可以吸收多种类型的财产，整体化对信托财产进行综合处置。这种处置模式有利于因案而异采取多样的财产处置组合，从而取得财产处置价值最大化。

4. 设有财产管理和监督架构

受托人的信义义务为债权人提供了破产财产的处置保障。《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对受托人的信义义务进行了原则性规定，要求受托人“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和有效管理的义务”。信义义务的核心在于其具有法定性。信托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受益人大会。受益人大会由全体受益人组成，负责信托计划各项关键事务的决策。受益人大会可下设管理委员会，受托人根据受益人大会授权和决议，对信托财产进行日常运营和管理。即使信托合同中未明确信义义务的具体内涵，若受托人违反法定义务并因此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其亦应根据其过错情形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4]。故受托人的信义义务为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红线，其必须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信托合同约定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置，保障了债权人（受益人）能够有效监督，债权人可以在信托计划中设立多层级的管理机制，以确保破产财产的有效管理，同时通过对破产财产后续处置设置有效的监管机制，可以提高破产财产的变价率，从而保障其债权利益最大化。因此，信托的管理架构可以使作为受益人的债权人对破产财产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以尽可能提高破产财产处置成效。

另外，基于受托人的信义义务以及当事人对信托财产管理方式的期待，债权人可以在信托中设立多层级的管理机制，通过互相监督和制约，以确保破产财产的有效管理。信托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受益人大会。受益人大会由全体受益人组成，

负责信托各项关键事务的决策,受托人应当根据受益人大会的决议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同时,受益人大会可下设管理委员会,由其根据受益人大会的授权,代表全体受益人对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日常运营进行协助和监督。而受托人作为信托财产管理处置工作的总负责人,主要负责信托财产的日常运营、管理和处置事宜,并负责执行受益人大会或管理委员会指令、选聘合格的执行人、协助监督信托财产的处置等。再次是具体执行人,负责在受托人的指导下,开展对破产财产的具体执行事务。即使选聘破产企业的原管理团队负责破产财产的具体处置,受托人也对其附有管理和监督职责。此外,还可以引入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担任信托监察人,比如管理人或债权人认可的其他第三方,代表债权人对受托人和具体执行人进行长期监督。信托监察人除了有权向债权人报告受托人或具体执行人的不当履职情况之外,还可以以其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受托人或具体执行人的行为。

5.可灵活处置破产财产

信托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信托法》只是对信托目的、信托利益的分配、信托财产的管理、受托人义务等信托核心事项,基于民法基本原则和信托制度的特点规定了必要的禁止性事项和应然事项,并未对信托的具体事务设置过多的阻碍。比如针对受托人义务,第二十五条仅仅原则性的规定要求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并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25]。信托的设立和运作更多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可以约定包括信托期限、信托利益分配方式、信托财产管理方式等内容,将信托打造成个性化的处置平台。故信托制度的这种灵活性能够实现当事人的诸多个性化安排,具有极大的弹性。这种个性化定制服务使信托计划可以更好适应不同破产案件中不同破产财产状况的管理需求。相比在破产程序中处置破产财产的模式,信托计划有更适当时间、适当方式处置财产的余地空间,可以寻觅到资产处置的市场价值高点,抑或是通过有效资产管理而实现增值,获得逆周期处置效果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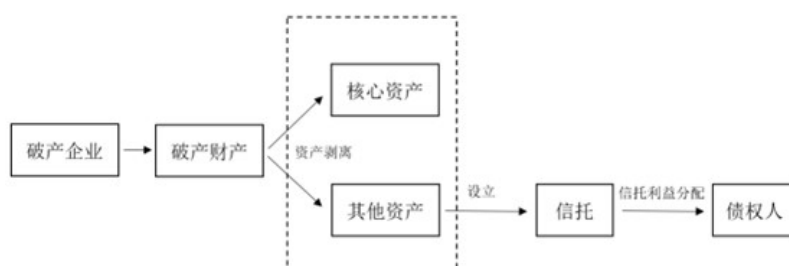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债转股清偿方式下债权人取得股权受偿后的收益是作为股东取得公司盈余分配或转让股权所得,而无论哪种收益方式,都必须首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强制性规定,该规制增加了债权人获得受偿利益的难度。通过信托路径处置,债权人获取清偿的对价是信托受益权。信托受

益权作为一种财产性权利，流转限制较少，债权人可以将受益权转让所得作为变现来源。

（二）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的实践模式

目前，实践中通过信托进行破产财产处置的模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1.通过信托对破产财产进行直接控制并进行处置。利用信托将当下不便处置或处置价值较低的破产财产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债权人作为信托的受益人，按照债权比例取得相应的信托受益权作为债权对价实现清偿，而后续对信托财产管理处分而取得的收益将作为信托利益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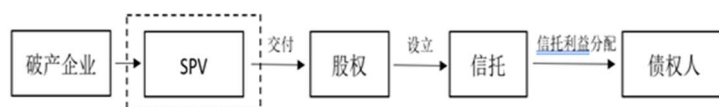


在 2019 年渤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钢集团”）破产重整案中，渤钢集团首先将破产财产拆分为两部分，分别由钢铁资产平台（以下简称“新渤钢”）和非钢铁资产平台（以下简称“老渤钢”）持有。其中，新渤钢计划接收渤钢集团的优质核心资产后继续运行，而老渤钢则承接渤钢集团的非钢资产（主要包括流动资产、部分股权受益权和运营业务等），并将其用于债务清偿。之后，渤钢集团作为委托人和初始受益人设立“建信信托——彩蝶 1 号财产权信托计划”，初始信托财产为渤钢集团持有的老渤钢的股权，信托期限为 10 年。同时引入第三方专业资产管理与运营团队负责对信托财产进行处置，并将处置后所得的价款作为信托利益向受益人进行分配。最后，渤钢集团根据债权人的债权数额和比例，将其持有的信托受益权作为对价向债权人进行分配 [26]。

而在 2022 年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建设”）破产重整案中，管理人利用信托将中科建设处置时间漫长的应收账款、对外股权投资等部分非核心资产剥离作为信托财产集中处置。中科建设通过其保留的一级建筑资质尽快恢复生产。同时，信托为债权人提供了信托受益权份额分配保管方案供选择，即经债权人申请，可以由信托公司保管其信托受益权偿债权利。保管期间，债权人不仅仍有权基于该信托受益权份额行使参加信托受益人大会、投票

表决等权利，而且有权以其全部的债权金额要求其他主债务人或担保人等偿债责任人承担相应清偿责任。此外，管理人还以“同质同价”“完全自愿”为原则，引入信托受益权兑换平台，为债权人实现债权提供商品、权益兑换选择，从而债权人可以更多元灵活方式处置权益，极大提高了中小债权人对于重整计划的接受度，有效促成了重整计划的表决通过[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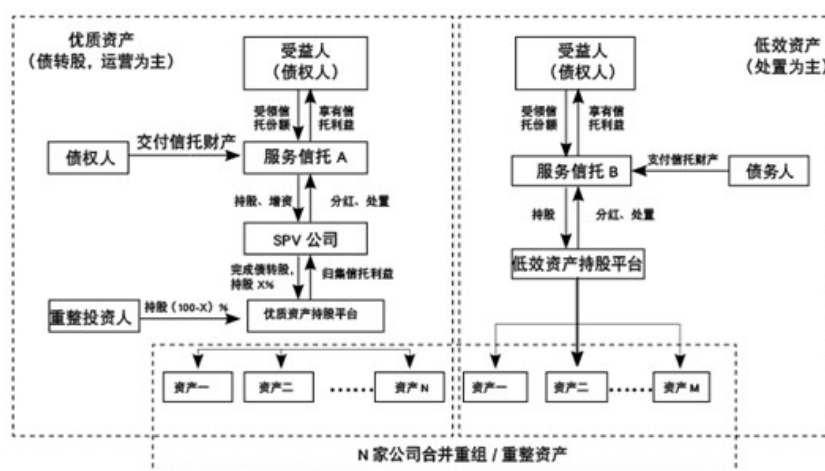
2. 通过将信托引入重整计划，实现对破产财产的间接控制并进行后续处置。这种模式以追求破产财产的持续经营价值为目的，利用信托对破产企业管理体系进行重构。破产企业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并将各类破产财产交付给该 SPV，随后 SPV 将其股权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在这种模式中，信托扮演的是一个类似于控股平台的角色，债权人通过信托受益权对破产财产进行间接控制，将 SPV 所持有的破产财产的持续经营收益作为偿债来源。



在 2021 年的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的破产重整案件中，海航集团设置总持股平台控制其名下的多个业务板块，并新设立发起人公司，由该发起人公司持有总持股平台 100% 股权以及海航集团对各业务板块享有的应收账款。随后，发起人公司作为委托人设立企业破产服务信托，初始信托财产为其持有的总持股平台 100% 股权以及应收账款，海航集团的全体债权人作为信托受益人取得信托受益权份额以实现债权清偿。信托设立后，将通过总持股平台实际控制和管理全部底层资产，信托的收益来源于股权资产的分红、处置收益以及应收账款的变现、处置，最终来源于重整完成后底层资产的经营收入、资产处置收入和未来战略投资者的投入等[28]。

上述两种模式中，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所发挥的主要价值和功能价值有三点，一是通过将债权转化为信托受益权，实现债权的快速清偿并尽快终结破产程序，以达到提升破产财产处置效率的目标；二是通过信托实现破产财产的逆周期处置。当破产财产存在不便立即处置或处置价值较低的情况时，可以通过信托中受托人的有效管理以寻找更合适的处置时机，获取更高的变价率；三是利用信托的灵活性，就信托的具体结构和信托利益的分配方式等进行个性化安排，有效促进破产财产的处置效率。

此外，上述两种模式的信托也可以同时运用在同一个破产案件中，针对同一家破产企业的不同类型破产财产，进行差异化处置。比如在 2022 年的阳谷祥光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光铜业”）的破产重整案中，为解决祥光铜业等多家关联公司存在的主营业务不聚焦、部分资产长期闲置、低效资产追回难度大且长期侵蚀利润、部分公司无实质业务呈空壳化状态等问题，祥光铜业将资产分为优质资产和低效资产。其中，A 信托发挥持股平台的功能，通过 SPV 公司承接祥光铜业的优质资产，信托利益来源于底层优质资产的持续经营收益；B 信托则归集祥光铜业的低效资产，将低效资产的后续变价处置所得价款作为信托利益的来源[29]。



三、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信托已经在多个破产案件中的破产财产处置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为一种新兴的处置工具，其目前也存在诸项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从而尽快完善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的相关机制。

（一）信托的定位和适用场景亟待明晰

什么样的破产案件适合通过信托进行破产财产处置是需要厘清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由于破产财产处置的终极目标还是要以变价等形式实现债权的清偿，而从现有的实践经验来看，信托扮演的是“中间商”的角色，其向债权人提供了一个破产财产的处置架构，但其本身并不涉及破产财产的变价等具体处置。管理人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将在破产程序中因种种因素不便处置的破产财产放在信托中进行延宕处置；或是通过对破产财产的管理结构调整，

使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利益主体以更有效的方式参与到破产财产的后续管理。这意味着，信托在破产财产处置过程中更多的是发挥破产财产的管理平台功能，债权人可借助信托对破产财产进行更有效的管理以实现破产财产处置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基于这一推论，不难看出信托其实并不适用于全部破产案件，只有在破产财产当下难以处置或需要通过后续管理以增大其价值的破产案件中，信托才能够体现其作为一种有效破产财产管理平台的意义。而对于那些几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或破产财产能够以公允价格进行处置的破产企业而言，盲目地将信托应用于破产程序中，反而会不必要地延长破产财产的处置期限、徒增破产费用，不利于实现破产财产的价值最大化，也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笔者认为，要规范信托的定位和适用场景问题，其核心在于提升管理人的履职能力。以上海破产法庭发布的《管理人个案履职评价办法（试行）》[30]为例，第五条就将“依法尽责管理和处分债务人财产，重大财产处置提请债权人会议逐项表决”作为评价管理人勤勉履职情况的指标之一。破产财产的处置虽然名义上是由债权人会议决议，但是实践中管理人对破产财产的具体处置方案具有相当大的操作空间。作为管理人勤勉尽责义务中的一项重要事务，管理人在处置破产财产时，应当先就主要的破产财产处置方式制定相应的变价方案，充分阐明拟采取的处置措施和预期后果，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对于拟引入信托进行破产财产处置的处置计划而言，由于其相较于一般的拍卖等处置方式而言，是一种更为小众的创新性破产财产处置方式，因此其所应当负担的成本和风险更需要管理人向债权人充分揭示。否则，不仅管理人存在未充分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可能性，也可能使破产财产最终的处置后果偏离债权人预期，影响破产财产的处置效果。

所以，要解决信托在破产财产处置中的定位和适用场景问题，最关键的核心应当由管理人基于勤勉尽责义务，结合破产财产的特点、债权人的处置预期以及市场情势等多方面因素，在比较拍卖、以物抵债等多项一般性处置方式前提下，向债权人说明引入信托进行破产财产处置的必要性和拟达到的效果，使债权人会议能够对处置方案做出合理、有效的决议。

（二）信托法律制度和信托治理结构需要完善

随着《信托业务三分类》将企业破产服务信托作为信托公司的一项业务品类，利用信托进行破产财产处置的模式已经获得了监管部门的认可，未来发展可期。但同时也必须要认识到，由于企业破产服务信托同时涉及信托制度和破

产制度两个条线的工作，因此如何做好《信托法》与《企业破产法》的衔接工作是企业破产服务信托进一步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石。由于破产程序的特殊性，信托在目前参与破产财产处置过程中会涉及与其在传统金融和民商事领域中完全不同的法律问题。举例而言，当企业破产后，破产财产上常常会存在负担着各类担保物权的情况，那么该破产财产是否可以作为有效的信托财产？如果可以，担保权人在申报债权后，其在信托中应当属于什么类型的角色？又比如，目前实践中主要采用以债权人获得信托受益权作为债权清偿的对价，但是这其中又可能存在信托受益权估值的问题，并可能由此涉及第三人担保责任范围的问题等等。可见，目前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的运作模式仅仅是一种粗略式的商业探索，从法律层面上而言，其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一系列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信托法》或《企业破产法》的修订，亦或是出台相应的规则予以明确。

除了法律层面存在的各项规则缺位外，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也缺乏涉信托治理结构的合规管理规范。信托治理结构指的是当事人在信托架构下对于信托目的、信托财产的管理方式、信托机构的设置、信托事务的监督决策机制以及各方权利义务体系的安排。由于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的特殊性，作为一类跨“司法-市场”领域的行政管理服务信托，涉及到司法部门、行政部门、破产企业、债权人、管理人和信托公司等多方面主体的协调配合，而这些协调配合的过程和方案就需要以信托合同中所确立的信托治理结构予以呈现，包括法院对信托方案的审查边界、信托财产的管理模式、受益人大会的决策机制、信托的监督机制等。通过建立起有效且完善的信托治理结构，利用信托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的信托目的才能更有机会予以实现。反之，信托财产的管理存在种种隐患，且最终会影响到信托财产的管理效果。虽然《信托业务三分类》已经确立了企业破产服务信托的定义，但是对于如何更好地落实和开展企业破产服务信托，仍然缺乏明确的指引和规范。因此，后续有必要由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针对其特殊性出台相应的业务指引，明确此类信托与破产程序的衔接问题，以及信托文件中应当记载的各类事项。

（三）受托人的主动管理能力有待提升

尽管具有多种功能和价值，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的最终效果的评判依然取决于破产财产是否获得了有效管理以达到处置价值最大化。如何通过信托对

破产财产进行实质有效的管理，提升破产财产的处置价值，是服务信托进一步发展所必须重视解决的一大问题。

从目前信托参与破产财产处置的实践经验来看，受托人主要担任的是信托框架的搭建工作以及遵照相关当事人指令开展事务性工作，很少涉足对信托财产的主动管理，导致信托无法真正体现受托人的管理能力，与破产案件各方当事人的期望相去甚远。这既不利于保障受益人的权益，也不利于更大程度引入信托参与破产财产的处置。

当然从客观角度而言，由于目前担任此类信托受托人的都是信托公司。其作为金融机构，对金融资产的处置更为擅长，对非金融资产的管理能力则相对欠缺。因此，为提高受托人对破产财产的管理水平，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针对破产财产中资产的类型，引入相应的第三方机构作为具体执行方，协助受托人处理信托财产，比如不同领域的资产管理公司（AMC）进行合作，协助对特殊类型资产进行综合化处理；二是探索多受托人模式。《信托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31]设置了共同受托人机制，多个主体可以在企业破产服务信托中担任共同受托人，并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明确各自应当处理的信托事务和职责。共同受托人之一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他受托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通过共同受托人机制，可以将第三方机构直接纳入受托人角色，施以其更严格受托人职责，整体提升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水平。

四、结语

近年来，市场和社会逐步接纳和认识到破产制度的价值，我国破产案件的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32]。作为破产程序的核心要务之一，如果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破产财产处置市场，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机制处置破产财产，充分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是未来我国进一步完善破产制度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征[33]。

作为一种新兴的市场化破产财产处置工具，信托已经在目前的实践中发挥较好的破产财产处置功效。虽然目前信托在参与破产财产处置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配套的法律体系和规则架构亦有待完善。但随着后续的不断发展和实践经验的增加，其必然能够进一步完善和成熟，改善现存的不足和缺陷，以

更好支持破产财产处置工作，助力破产制度实施成效的提升和营商环境的建设。

脚注：

[1] 李曙光：《破产法的重要性及商业价值》，“破产法快讯”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GOUKPpsI9bZSHkF39TnIzg>，访问日期：2024年9月30日

[2]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6条

[3]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编著：《破产法立法指南》p.10，“2.资产价值最大化”

[4] World Bank Group: Business Ready Methodology Handbook May 2023 p.732, 1.2.1 Management of Debtor’s Assets, “The main objective of insolvency proceedings is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debtor’s assets”

[5]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6条

[6]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编著：《破产法立法指南》p.11，“5.及时、高效并公正地解决破产事务”

[7] Business Ready Methodology Handbook May 2023, “Pillar III – Efficiency of Resolving a Judicial Insolvency Proceeding in Practice (4 indicators)”

[8] World Bank Group: Business Ready Methodology Handbook May 2023 pp.651-652, “Cost-effective insolvency proceedings can encourage inefficient firms to exit and embolden greate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new firm creation.”, “Excessive length of restructuring and business discharge is key in triggering loss of value for the enterprise.”

[9] 《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除债务人所有的货币、实物外，债务人依法享有的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用益物权等财产和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均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

[10] “阿里资产·破产”网站，《(破)瑕疵债权转让》，https://zc-paimai.taobao.com/court_item.htm?user_id=2215787400148&auction_source=0&st_

param=-1&auction_start_seg=-

1&q=%E8%A6%B4%C3%D5%AE%C8%A8%D7%AA%C8%C3

[11] 《广东日之泉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次破产财产分配公告》——附件 1：
《广东日之泉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次破产财产分配表——附件：广东日之泉集团
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2016）粤 1971 民破 4-7 号，
<https://pccz.court.gov.cn/pcajxxw/pcgg/ggxq?id=BA845E0DA626DA98D27B64D3E1A531EB>，访问日期 2024 年 8 月 25 日

[12] 日之泉公司破产案的最新公告为 2024 年 7 月 7 日发布的《广东日之
泉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关于第七次债权人会议债权核查结果的通知》，
<https://pccz.court.gov.cn/pcajxxw/pcgg/ggxq?id=9A4DBBE6F3D7EBC854363C8DBDC47F4D>，访问日期 2024 年 8 月 25 日

[13] “阿里资产·破产”网站，《（破）上海市工业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拟
出售土地及上盖在建工程》（结束时间 2019/12/27 10:00:00），https://susong-item.taobao.com/auction/610115111890.htm?spm=a2129.27076131.puimod-pc-search-list_2004318340.8&pmid=3380062943_1728530095628&pmtk=20140647.0.0.0.25287167.puimod-pc-search-navbar_5143927030-input.1&path=25287167%2C27076131&track_id=913d035e-c45f-4c83-825d-1b58929a2223；《（破）上海市工业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出售土地及上盖在建
工程》（结束时间 2024/08/22 10:02:17），https://susong-item.taobao.com/auction/822202729153.htm?spm=a2129.27076131.puimod-pc-search-list_2004318340.3&pmid=3380062943_1728530095628&pmtk=20140647.0.0.0.25287167.puimod-pc-search-navbar_5143927030-input.1&path=25287167%2C27076131&track_id=9a376bfa-8e5b-4791-bccb-2e63f2481f5d，访问日期 2024 年 10 月 6 日

[14] 《企业破产程序中知识产权处置的路径》，黄亮，《中国审判》2024 年
第 10 期

[15] 《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6 条，网络司法拍
卖竞价期间无人出价的，本次拍卖流拍。流拍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在同一网络司
法拍卖平台再次拍卖，拍卖动产的应当在拍卖七日前公告；拍卖不动产或者其他

财产权的应当在拍卖十五日前公告。再次拍卖的起拍价降价幅度不得超过前次起拍价的百分之二十。

[16] “阿里资产·破产”网站,《(破)苏州新苏公司名下的房产(在建工程)、机动车等(四拍)》(结束时间 2023/04/11 10:00:00) https://susong-item.taobao.com/auction/709277794865.htm?spm=a2129.27076131.puimod-pc-search-list_2004318340.1&pmid=2696450936_1723362970426&pmtk=20140647.0.0.0.25287167.puimod-pc-search-navbar_5143927030-input.1&path=25287167%2C27076131&track_id=04605968-550c-463f-a638-df3f3985ba9e, 最后访问日期 2024 年 8 月 7 日

[17]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保交楼”背景下房地产企业破产在建工程续建问题研究》,“上海第三中院”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CDq3V1fktJz68ZtECn-HTw>, 访问日期 2024 年 10 月 9 日

[18]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九条,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已接管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人应当向债务人移交财产和营业事务。

[19]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投资人违约问题初探》,王兆同, <https://mp.weixin.qq.com/s/wAu54SNdv9sOWfaEgJJsOg>, 访问日期 2024 年 12 月 7 日

[20] 《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附件 1-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具体分类要求

[21] 《信托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四十四条

[22] 高凌云:《被误读的信托——信托法原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8 月第 2 版

[23] 《信托法》第七条: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本法所称财产包括合法的财产权利。《信托法》第十四条:受托人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财产是信托财产。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也归入信托财产。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不得作为信托财产。法律、行政法规限制流通的财产，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作为信托财产。

[24] 参见“甘孜州农村信用连社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终 880 号

[25] 《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26] 新浪财经：《从三个经典案例看信托公司如何参与企业破产重整》，<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618470307523207&wfr=spider&for=pc>；《资产情况表（债权转让）》，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cfae.cn/business/xd/pingan/tianjin/ZS210207000041/index.html，访问日期 2024 年 8 月 26 日

[27] 《获奖案例！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上海破产法庭”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k8TecOZAgOH6GJIUThM9lA>，访问日期 2024 年 10 月 18 日

[28] 海航冷链（证券代码：831900），《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 321 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11 日，<http://xinsanban.eastmoney.com/Article/NoticeContent?id=AN202110111521990472>，最后访问时间 2024 年 8 月 26 日

[29] 孟凡科、金子颖：《由典型案例谈企业破产服务信托》，“中国信托业协会”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xKvpbqtoPEuF6c1OtyNitA>，访问日期 2024 年 10 月 17 日

[30] 上海破产法庭，《管理人个案履职评价办法（试行）》，<https://mp.weixin.qq.com/s/9Q6N-cHUhnbkijiVqHdFuQ>，访问日期：2024 年 12 月 8 日

[31] 《信托法》第三十一条：同一信托的受托人有两个以上的，为共同受托人。共同受托人应当共同处理信托事务，但信托文件规定对某些具体事务由受托人分别处理的，从其规定。共同受托人共同处理信托事务，意见不一致时，按信托文件规定处理；信托文件未规定的，由委托人、受益人或者其利害

关系人决定。第三十二条:共同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对第三人所负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人对共同受托人之一所作的意思表示,对其他受托人同样有效。共同受托人之一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他受托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2022年和2023年全国破产案件的收案数量分别为16187件、20119件和26662件,涨幅分别为24.29%和32.52%。《2021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a6c42e26948d3545aea5419fa2beaa.html>;《2022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20587eaf248beb61ed6596018865c.html>;《2023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a3e86176b272dc94a05d9cb012c2d5.html>。访问日期2024年8月20日

[33] 刘贵祥:《在第十四届中国破产法论坛上的主旨发言》,中国破产法论坛, <http://www.fxcxw.org.cn/dyna/content.php?id=26487>, 访问日期2024年9月25日

企业破产中的环境责任问题

- 信息来源：人民司法杂志社 作者：陈怡然、徐阳光（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 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4wDoBvhE-rAsTLs35qqXwg>

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并要求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对破产制度的发展完善作出重要部署。如何在破产程序中彰显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责任，将民法典确立的绿色原则融入破产程序，是新时代破产法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在我国破产审判实践中，一些法院已经开始关注破产企业环境责任的落实和环境债权的保护问题；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14号指导性案例确立了破产重整案件中环境治理费用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认定规则。本期特别策划展示了法院在处理破产法与环境法的冲突以及构建绿色破产制度方面的有益探索，为有效应对企业破产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围绕企业破产法的修改与环境法典的制定进行相应探讨。

内容提要：

以困境拯救和公平清偿为立法宗旨的破产法与以损害担责为基础的环境法之间存在价值理念上的冲突，为避免破产法成为破产企业规避环境责任的工具，有必要在破产立法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价值予以回应。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与世界银行 B-Ready 报告为破产法中环境责任的落实提供了良好实践的指引。我国在企业破产法修改与环境法典制定之际，应当进一步明确环境债权的内涵及其范围，并在现有的破产法债权清偿顺位体系下，通过解释论的方法对紧急且必要的环境债权予以优先保护；在破产法自动中止规则中加入公共政策的例外情况，并对例外情况予以必要的限制，以确保破产政策在社会公共利益与债权人利益之间作出必要的平衡。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对于“深

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再次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破产法作为困境企业拯救和市场主体出清的重要法律制度，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一方面，世界银行 2024 年 10 月 4 日发布的营商环境评估报告（B-Ready 报告），在第一支柱“监管框架”下强调了对企业破产环境责任落实情况的考察，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了“办理破产”指标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我国 2024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新公司法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在第二十条明确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国家鼓励公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公布社会责任报告”。

“生态文明”理念在破产法中的落实，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实现“双碳”目标、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要求。企业在破产程序中的环境责任之落实，核心内容在于与维护公共健康和安全相关的成本是否应当以及如何通过破产债权清偿机制进行合理的分配。本文着眼于企业破产程序中环境责任的落实，从破产法与环境法的价值冲突与协调切入，分析环境债权的范围和类型，并对破产程序中自动中止的例外情形展开分析，以期为我国企业破产法修改如何构建“绿色破产”制度提供参考。

一、破产法与环境法的冲突与协调

破产法与环境法的价值目标存在固有的冲突。前者旨在通过对债务人过往负债“网开一面”，为债务人提供一个“全新开始”的机会，或者为债务人提供市场出清的法律途径；后者则要求当事人对因环境污染等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责到底。如何处理两者的冲突，成为了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破产法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破产法与环境法的价值冲突

在环境法领域，“污染者付费”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旨在采用一种统一的方法，将造成污染的企业的成本内部化，包括企业为预防和控制其活动造成的污染而采取的成本，以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行政成本。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建议成员国采用“谁污染谁付费”原则，防止一些国家故意采取宽松的环境立法政策，从而吸引企业因较低的资本和运营成本落户。

在破产法领域，困境拯救与公平清偿是破产制度的价值追求。一方面，破产法旨在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清理现有的债务负担，允许债务人通过合法有序地摆脱其部分现有债务的方式获得“全新开始”的机会；另一方面，破产法强调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并确保企业债务与营业重组目标的实现，或者为全体债权人提供有序清偿。然而，环境法中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则要求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企业将其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对实施环境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不利后果负担到底，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紧张关系。

破产法基于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衍生出的域外对于“繁重”资产的放弃权，是破产法与环境法紧张关系的极端表现，因为对“繁重”资产的放弃无可避免地与环境法中“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产生冲突。美国曾出现过企业利用破产程序中的战略性重组安排来逃避环境责任的案例。自 2012 年以来，美国最大的 4 家煤炭生产商利用美国破产法典第 11 章免除（或以其他方式避免）了约 52 亿美元的监管债务，这些监管债务占破产清偿债务总额的 22%。煤炭公司主要利用了其放弃“繁重”财产的权利，通过分拆资金不足的子公司，并让这些子公司对母公司的环境监管义务承担法律责任，得以将生产性资产与繁重的环境责任分离开来，当对于资金不足的后继实体进行清算时，公司的环境债权通常难以得到清偿。在美国法上，要放弃财产，受托人只需向破产法院证明这些财产是累赘或价值不大。虽然美国破产法典第 11 章规定，受托人或债务人必须向法院证明对财产的放弃有“充分的‘商业原因’或‘明确的商业理由’”，但这一要求很难形成实质性的障碍，因为环境责任的履行通常一定会表现为某种经济上的负担。

破产程序下的环境责任的归属问题，本质上是应当由何方承担破产污染者所带来的环境责任，与单纯涉及经济关系的破产财产分配机制有所不同，破产程序下环境责任的履行要求立法者将环境责任所蕴含的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置于破产法所规定的债权实现机制之下进行考量，以确保即使在企业破产的情况下，由破产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也能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处理，进而实现环境正义，保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破产法与环境法价值冲突的协调

破产法与环境法价值冲突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立法本位的理论层面来看待两者之间价值目标的内在一致性，据此实现规则上的有机统一。以历史视角考察，

破产法经历了由债权人利益保护到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重再到社会利益为本的演变过程。破产法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对债权人利益进行绝对保护，后续发展为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对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最终演变为追求各方利害关系人价值最大化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换言之，破产法是“追求国家、社会与私人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与协调”之法，因此，当破产情形涉及环境责任时，必须充分考量公共健康与安全方面的因素，以确保即使在企业破产的情况下，破产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也能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处理，进而实现环境正义，保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的环境责任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环境的可持续对确保经济增长和发展十分重要。外部性理论认为，生态环境是一种具备显著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当企业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时，其生产经营活动往往会产生负面的环境外部性。为了弥补企业自我约束的不足与缺失，有必要对企业施加相应压力并制定相应规范。环境责任正是这些压力和规范的具体体现。破产企业作为非常态下的企业形态，对环境责任同样有着不可回避的履行义务。

我国破产审判实践中也认识到了破产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开始关注破产企业环境责任的落实和环境债权的保护问题。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探索的破产企业“生态e治”系统开始在杭州地区推广。该系统实现了多跨协同、整体智治、高效运转的数字化改革成效，推动破产企业生态环境治理制度重塑、模式变革和司法能力提升。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强化绿色破产理念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举措（试行）》，规定加强对破产企业资源环境要素的识别，防止企业通过破产程序逃避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和损害赔偿等责任，打造绿色破产南京模式。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等11家单位共同出台了《关于建立绿色破产工作机制 助推产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制定了包括建立绿色破产环保协作机制、破产重整企业招商引资产业可行性评估机制、破产重整计划的绿色评估机制等在内的十大举措。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三大维度对企业评估，以是否符合绿色、低碳、可持续等发展要求作为识别企业是否具备重整价值的重要因素，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出台《关于破产审判涉企业环境权益保护备忘录》，明确了环境权益识别、环境部门指导、环境资产处置、债权性质认定、绿色重整、绿色融资、环境监管等内容的具体原则。此外，已有案例探索将生态环境治理费用作为破产费用优先列支，引导破产企业管理人履行

生态保护职责。实践中的有益探索为我国处理破产法与环境法的冲突和构建绿色破产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破产程序中环境债权的范围及其类型化

破产法中的环境债权保护，是两法冲突协调中的首要问题。“环境债权”并非破产法中具有特定内涵的法律概念，而是用以指代与破产企业涉环境类侵权之债、合同之债相关的一系列债权的统称。环境债权若要在破产法的受偿分配机制下得以实现，必须首先被归入到破产法规定下的“债权”的范畴，讨论环境债权在破产程序下的优先保护机制，应首先明确“破产债权”的范畴，并对其作出进一步的类型化分析。

（一）环境债权的范围界定

理论界关于“环境债权”的界定存在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上的“环境债权”仅限于环境侵权责任所引起的债权。如有观点认为，“因承担环境侵权责任所引发的债权即为环境债权”，另有观点认为，“环境债权”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侵权行为导致的债权，侵权结果表现为公共财产或者他人在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等方面受到自然环境遭受污染或破坏造成损害，这种损害的源头是公司不当活动或规划及其他人为的原因。广义上的“环境债权”则包括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即“因债务人环境侵权行为或环境合同违约等所发生的权利人请求债务人给付一定金钱的权利”。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善，环境法律责任的形态逐渐丰富多元，仅仅将环境侵权责任作为产生破产债权的原因可能过于片面，对于“环境债权”应当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进行理解，包括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时所负担的环境侵权之债和环境合同之债，也包括进入破产程序后所产生的环境治理填补修复之债及环境资产处置之债等。

环境债权应当首先符合破产法中关于债权的一般定义，才能认定为破产程序中的环境债权。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破产债权通常包括因破产程序启动前的原因成立、属于财产上的请求权、可强制执行的债权、经依法申报并取得确认、有权在破产程序中受偿等成立要件。因此，在破产法的语境下讨论环境责任处理问题，应当首先认定是否符合上述几个要件。在山东省环境保护厅与山东金诚重油化工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责任纠纷案中，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山东泓聚新能源有限公司公开赔礼道歉，而此时山东泓聚新能源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赔礼道歉这类具有人身专属性质的责任，无法转化为货币形式的财产给付请求权，故不属于破产债权的范畴。

在环境债权范围的确定上,美国司法实践中曾围绕禁令等非金钱类债权是否属于破产债权这一问题产生过较大的争议。一般认为,仅仅指示债务人停止污染的消极性命令或禁令不属于破产债权,但对于指示债务人采取纠正行动的积极性命令或禁令是否被破产债权的范围所涵盖,如安装污染控制设备、补充湿地或恢复带状矿山,法院的意见则存在分歧,特别是对于必须支付相应费用才能遵守的肯定性命令或禁令规定。有的法院认为,即使这种命令要求债务人支付相应费用,也不属于破产债权,因为政府此时已经无权要求破产中的债务人继续支付这些费用。然而美国的大多数法院裁定,强制债务人支出金钱的积极性命令或强制性禁令实际上属于破产债权的定义范围。实际上,由于大多数行政命令或禁令都包含停止当前排放的消极因素,以及清理可能导致当前污染的先前排放污染物的积极义务,如果某一项旨在督促债务人或管理人积极清理污染物的指令能够转化为金钱上的给付内容,那就理应纳入破产债权的范畴进行处理。

（二）环境债权的类型

关于环境债权的具体类型,有学者将其进一步细分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债权、环境侵权人身损害赔偿债权、环境侵权财产损害赔偿债权、环境合同违约债权、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债权、环境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债权。

首先,根据债权产生的原因不同,可将其分为环境侵权之债与环境合同之债。前者源于企业或个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造成财产或人身方面的损害,从而产生赔偿责任;后者则基于企业或个人在签订环境责任合同时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如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污染物排放的控制等合同。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包括能源管理、环境治理服务、环境影响评价服务等为典型内容的环境服务合同。

其次,在环境侵权之债中,又可以根据债权产生的原因、受偿主体、保护的利益不同划分为公益类的环境侵权之债与私益类的环境侵权之债,前者受偿主体为政府,所保护的利益表现为不特定公众的人身健康和公共利益。根据 2022 年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 5 条的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可能包括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而后者以个人为受偿主体,包括环境财产侵权之债与环境人身侵权之债。其中,环境财产侵权之债主要是指因企业环境侵权行为给私人主体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环境人身侵权之债则主要是因企业环境侵权行为侵害了债权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所要承担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各类赔偿费用。

我国司法机关对于不同类型环境债权在破产程序中清偿顺位的认定采取的态度大致可分为4类：一是关于破产申请受理后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债权，如污染的紧急清理费用、环境修复费用、防止损害发生或扩大的费用等，实践中通常将该部分费用认定为共益债务或破产费用；二是将环境侵权人身损害赔偿债权参照职工债权的顺位清偿；三是将破产申请受理前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债权、环境侵权财产损害赔偿债权、环境合同违约债权归入普通债权的顺位清偿；四是将破产申请受理前的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债权、环境行政罚款债权、环境刑事罚金债权作为劣后债权清偿。

综合考察而言，对环境侵权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与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债权的处理已形成了共识。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为人身侵权损害赔偿债权的优先清偿顺位提供了依据。因环境污染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债权应当参照职工债权的清偿顺位，享有优先受偿地位。环境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与普通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债权并无不同，基于保护相对弱势群体和社会公益的考量，赋予环境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与职工债权同一顺位受偿的优先地位，符合破产债权顺位的基本原理。其次，环境污染类罚款、罚金等惩罚性赔偿责任债权应当依据其本身的属性适用相对应的清偿规则。从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来看，破产法并不鼓励对此类债权予以优先清偿，因为这些费用并不直接对公众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相反，若赋予此类债权以优先受偿的地位，这些债权清偿的负担将转移到其他无担保的普通债权人身上。

（三）不同类型环境债权的清偿顺位

在破产程序中，决定环境债权能否得到清偿的核心问题在于该债权相对于其他对破产财产的清偿优先权。如前所述，“破产债权”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内容丰富、类型多元的债权，倘若对所有与环境保护类有关的债权不加以区分地优先保护，实际上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甚至破坏破产法的制度根基，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破产法作为社会本位之法和利益平衡之法，理应对各类具体的环境类债权清偿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环境债权的清偿顺位应当在前述类型化基础上进行分层处理：

一是应当优先保护的环境债权。环境责任产生的债权应当列入优先保护级别的主要包括两部分：

（1）破产申请受理后产生的环境污染资产处置、清理费用、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对于破产企业存在的污染问题应当依法处理，此时往往涉及危废物品的处置和损害预防及止损等费用，若不及时处理，不仅会损害破产企业的利益，甚至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此类处置行为涉及的费用支出往往具有特殊性，在实践中通常被认定为共益债务或是破产费用，但对于二者应如何认定仍存在分歧。譬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214号上海某某港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案，通过将破产重整案件中环境污染治理费用认定为共益债务，确立了破产程序中的环境治理费用可由破产财产随时清偿的规则。在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中，管理人将破产程序中的生态环境治理费用作为破产费用优先列支。尽管共益债务与破产费用都是从债务人财产中随时拨付，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一些不同之处。通常而言，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后发生的成本或支出可作为破产费用，只有当管理人的某项支出对于破产财产而言是必要的，且增加了某项财产的价值，或对破产财产有利时，才可被认定为共益债务。例如，在破产申请提交后支付的土地租金或税款，或必要的资本改良，都可以被认定为是对破产财产有利的必要支出，破产法承认并“奖励”此类支出对破产财产的价值，将其归入共益债务，赋予其优先于除担保债权以外的债权优先受偿的地位。在破产企业的环境责任方面存在涉及对危废物处置的情形。一方面，如果管理人不对破产企业残留的危废物及时处置，不仅既有的资产价值会持续降低，用以维护、承载此类资产的成本也会逐渐上升，污染环境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因此，此类费用的支出不仅必要且具有更强的紧迫性，从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二者的优先次序来讲，应当归入更为优先的破产费用范畴。另一方面，从对危废物的处置目的来看，其主要在于防止污染风险的进一步扩大，但相应的处置行为未必会提高财产的价值，从外观上与共益债务的基本特征并不相符，更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中管理债务人财产或执行职务的情形，认定为破产费用更为恰当。

（2）破产受理前产生的环境人身损害赔偿之债。笔者认为，此类债权在性质上与企业破产法中明确规定的职工债权中的医疗、伤残补助等赔偿性质相似，应当仅次于担保债权、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优先受偿。劳动者属于弱势群体，职工债权具有生存权与人身权属性，为维系社会稳定及保护民生福祉，其应当得到

全面而优位的保护，因此，对于进入破产程序之前的环境侵权人身类损害赔偿，应当参照职工债权的顺位予以优先清偿。

二是应当作为普通债权进行清偿的环境债权。如前所述，旨在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债权应享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地位，但任何超出此立法目的的支出都不得纳入优先级别清偿。据此，环境责任产生的债权可归入普通债权范畴的主要包括破产申请受理前发生的环境合同债权和环境侵权债权。这两类债权主要基于破产申请前的侵权、违约等行为所产生的金钱给付义务，通常不涉及较为紧急的环境污染风险，与债务人所负的其他合同之债并无显著区别。实践中较为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进入破产程序后产生但与破产程序前的污染行为有关的清理费用。与普通的侵权行为相比，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在于其发生的隐蔽性、长期性与累积性。一些环境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往往不会立刻显现，而是在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后经过长时间的累积后逐渐凸显，且损害后果通常具有持续性。对于此问题，美国法院意见也不一致。有的法院认为，此类债权应被视为进入破产程序的普通债权，因为这些修复或补偿费用是在申请前发生或产生的。

例如，美国新泽西管区的破产法院曾在案件中认为，由于所涉环境危害并未对公众健康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前出租人对债务人提出的与该危害有关的清理费用的债权无权享有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的地位。法院的理由在于：第一，危废污染物在被清除之前一直得到很好的控制；第二，没有任何监管机构命令债务人清除废物；第三，在进行清理时，债务人已在近两年前拒绝了租赁财产。但是更多数的意见则认为，对于申请后产生的清理费用，无论污染行为是何时发生的，都应将其认定为共益债务，因为正是由于这些清理行为才能使得破产财产能够符合环境法的要求，此类清理费用应当是维护破产财产的实际必要费用。由此可见，域外司法机关在认定此类债权的具体性质时，除了会将债权产生时间等客观因素作为基本判断依据之外，也会将公平性要求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关注所支付的费用是否存在紧急性和必要性。如果破产企业所造成的环境危害并不直接对公共利益构成紧迫的威胁，那么与该危害有关的清理修复费用的债权则无权享有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的地位。笔者认为，在处理因破产申请前的环境侵权行为引发而在破产申请后形成的环境治理修复费用时，应当综合考虑多项因素，如债务人做出导致污染发生的行为时间、债务人被提起环境侵权诉讼的时间、环保部门代为履行补救措施的时间等。对于为制止正在发生的生态环境污染行为，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止污染或破坏发生、遏制损害进一步扩大而支出的费用，即便其污染

行为发生于破产程序受理前，也符合共益债务“为债权人、债务人的共同利益所负担的债务”之标准，应当以共益债务认定，给予其优先受偿的地位。

三是应当作为劣后债权进行清偿的环境债权。环境责任产生的债权应当劣后的类型主要包括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中的罚款、罚金类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债权。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债务人的资产通常已经不足以偿还全部的债务，若将该部分惩罚性质债权同样予以优先保护，实际上是将本应由债务人承受的处罚转嫁到了无辜的普通无担保债权人身上，有违破产法的实质公平。

三、自动中止例外规则中的环境责任

世界银行 2024 年营商环境评估报告（B-Ready 报告）在“商事破产”指标中的“清算和重组期间债务人资产的处理和保护”部分，重点考察了一个经济体破产程序的中止规则中是否存在基于限制破坏环境或其他有损于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公共政策的例外情况。自动中止规则是保障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功能在破产程序中最为集中的体现，在实现环境法与破产法日益协调的目标下，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自动中止规则例外情况在我国的破产法体系下的必要性。

（一）破产程序中的自动中止规则及其例外

破产法上的自动中止规则是指破产程序启动时，所有针对债务人的实现债权的行为都自动归于停止的制度。对债务人来说，自动中止规则是破产法为债务人提供的基本保护之一，它使得债务人获得了与债权人隔绝的喘息机会，并能够停止所有的收债行为、骚扰和取消抵押物的取回，允许债务人尝试还款或重组计划，或者仅仅是为了减轻迫使其破产的财务压力。对债权人来说，如若没有自动中止规则加以限制，部分债权人就能够对债务人的财产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导致在先采取行动的债权人将获得优先受偿，而在后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得到保障。破产法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有序的清偿程序，使所有债权人得到平等对待，从而防止债权人争先恐后地抢夺债务人的资产。

自动中止规则存在一些特殊的例外情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对于自动中止的例外情形作出了说明，其中包括“抵销权和资金合同的净额结算；为保护公共政策利益而进行的诉讼，如遏制对环境的损害或有损公共健康或安全的活动；为防止滥用而进行的诉讼，如利用破产程序掩盖非法活动；为保全对债务人的债权而启动的诉讼；就涉及人身伤害或家庭法的债权而针对债

务人提起的诉讼”。在美国破产法上，与环境债权常常交织在一起的问题是“政府和警察监管”的例外情况，根据美国破产法典第11篇第362(b)(4)和(5)条，政府的行政或执行诉讼将不受自动中止的限制。政府对于环境责任的监管通常被视为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重要手段，该规定旨在防止环境案件中的义务人通过利用破产程序下的自动中止来逃避环境责任。这一自动中止的例外情况往往被适用于破产程序中的环境责任。

（二）我国自动中止例外规则的构建及其限度

我国破产法上的自动中止规则具体表现在进入破产程序后债务人财产保全的解除和执行以及民事诉讼、仲裁程序的中止。此外，企业破产法七十五条规定的重整程序下担保权暂停行使也可以归入自动中止的范畴。现有自动中止规定的缺失之一，就是没有明确自动中止是否存在任何公共政策例外的情形。借助我国企业破产法修改的契机，笔者建议参考联合国贸法会《破产法立法指南》，例如，对于正在进行的为阻止环境损害或有损公共健康或安全的强制措施、强制执行等，应当作为自动中止规则的例外情况，从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更为优先的价值取向。

尽管美国破产法中对于自动中止的例外情况进行了特别规定，但在这一例外规则中又作出了特别的“例外”规定：某些政府行为不受自动中止的限制，但并不包括金钱判决。换言之，美国破产法典第362(b)(4)条政府单位执行金钱判决的情况不包含在自动中止例外的范围之内。将执行金钱判决作为“例外中的例外”，是为了防止政府单位的债权相对于其他债权人获得更为优先的地位，但对于如何解释“金钱判决”，不同法院之间也存在分歧。根据美国破产法典第11章第362(b)(5)条的规定，积极的环境污染责任不适用自动中止以及例外情况。美国法上，适用“警察或监管权力”例外的主要案例之一是潘特拉（Penn Terra）有限公司诉环境资源部案。地区法院认为，执行该法令实际上等同于执行金钱判决，故应当属于“例外中的例外”而应当适用自动中止。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认为环境资源部的行为符合自动中止的例外情况所规定的行为类型。在潘特拉案中，法院对禁令是基于过去损害的救济还是阻止将来的损害作出区别。上诉法院认为，政府所采取的禁令是一种旨在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损害而采取的补救措施，也并未表现为一个确定的金额，因此不属于金钱判决。根据这一推理，如果补救措施是为了对过去的损害进行赔偿，则应当被视为执行金钱判决；如果是为了防止未来的损害，则不是执行金钱判决，旨在补救未来不法行为的禁令不应受到自动中止的

限制。这一判断原则给美国的司法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并在后续多个案件中被引用。但问题在于，防止未来损害与补偿过去损害的措施之间界限是模糊的，政府所采取的一项禁令可能同时包含这两个部分，因此，该原则的合理性也很快遭到了诸多质疑。

在其他的一些案件中，美国司法机关对于自动中止例外情形的判断逐渐形成了“金钱目的测试”标准。例如，在新泽西州环保局在债务人申请破产保护4年后提起的诉讼中，美国破产法院认为，其目的并不是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而只是为了清偿其罚款债权。法院进而认为：“就所谓的虚假报告寻求罚款的行动，如果该行动不是为了解决危及公众健康、安全或福利的风险，并且在风险不再存在的情况下，不属于第362(b)(4)条规定的自动中止的例外情况。”在 *Safety-Kleen, Inc.诉 South Carolina* 案中，法院确定了南卡罗来纳州卫生与环境控制部不能在不违反自动中止令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保证金，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裁决，认为南卡罗来纳州卫生与环境控制部执行保证金的要求是行使行政监管和警察权，并将这种执行与国家仅仅保护其金钱利益的情况区分开来。法院的理由是，应当关注政府机构执行法律的目的，如果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公共安全和福利或“执行公共政策”，则适用自动中止的例外情况。与此相反，“如果法律的目的涉及保护政府在政府财产中的金钱利益，或是对私人权利进行裁决，那么例外就不适用”。根据这一检验标准，法院认为，企业缴纳的保证金属于自动中止的例外，因为要求支付保证金的主要目的在于“在危险废物设施的设计和运营中促进环境安全”。其他法院也同样认为，执行保证金的要求是“明确行使国家监管权”，因此此类诉讼不在自动中止之列。

为了实现污染企业的生态环境治理、修复的责任，管理人往往需要花费破产财产中的资金来执行，进而导致这些资金可能无法分配给顺位靠后的无担保债权人，由于我国企业破产法并未明确规定将环境债权作为优先债权还是普通的无担保债权进行处理，因此应当尽量避免政府行政权力对破产法秩序的干预。自动中止规则应当确定一个必要的限度，从而确保环保部门的监管行为与破产法的市场化法治化实施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美国司法实践中发展出的“金钱目的测试”的合理性和严密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对于如何认定“为保护公共健康与安全”之目的具有一定的启发，即对于公共政策的目的应当进行严格的目限缩解释，在对自动中止规则例外情况适用的判断上，司法机关应结合具体个案的实际情况予以权衡，当某种强制执行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和保障公共安全和福利，那么理应作为自动中止规则的例外，但不宜超越保护公共利益目的的限度。

结语：

破产法与环境法的冲突，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就是规则的缺失和不协调。解决破产法与环境法的冲突，就是要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彼此互认且相互协调的规则作为处理的依据，而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法理念与法本位层面的深度探讨。此外，本文是在企业破产法修改和环境法典制定的背景下展开分析，但囿于能力与篇幅，本文并未对主题项下的所有问题进行探讨，比如，与环境有关的特殊资产（如探矿和采矿许可证、碳排放指标等）的评估和交易问题，废弃物资在破产程序中的清理和处置问题，都是值得破产法和环境法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关注和探讨的问题。